TIAN JIN SHI ZHI

目 录

志鉴交流

编修地方志要着力彰显三大特色 …… 赵 菁（3）

关于提高《津南年鉴》质量的研究与思考

…… 蒋玉秋 张合德（7）

史学百家

天津方言的移民基因 …… 郭凤岐（11）

张伯苓参选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之争 …… 刘志凯（15）

天津集贤书院沿革述略 …… 李琦琳（18）

韩荫桢与《冬青馆诗存》…… 侯福志（24）

志述津沽

汉沽“桐裕成”张家三代人发家史略述 …… 王雅鸣（28）

抗战前的南开话剧 …… 宋伯玥 王 焱（31）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贺家口引河的前世今生 …… 章用秀 (34)

天津革命史之五村农民反霸斗争 …… 王文振 (40)

早年天津卫“银子窝子”——竹竿巷 …… 温　鹏 (43)

无瑕街道的三座古庙与花会 …… 刘培猛 (48)

精武会从天津走向世界 …… 王洪海 (51)

宁河人不能忘记的一中校长——杜书田

…… 孟昭林　王士兴 (56)

召公立燕与邦均地名的由来 …… 王　辉 (60)

信息动态

市级信息动态 …… (62)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举办名镇、街、村志编纂业务

培训班 …… 天津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二)

天津市地方志馆文献资料室恢复开放 …… 天津市地方志馆 (封三)

2020 年第 5 期(总第 190 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关树锋　梁　娜
白文平　张月光
岳　宏　李　娜
沙　洵　宋铭月
王中玮　韦　恬
刘　新　郭天天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 号增 1 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刊型 2020026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500 册

编修地方志要着力彰显三大特色

赵　菁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其性质和目的在于存史、育人、资政，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留存后世的千秋大业。地方志作为记载行政地理状况、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风俗文化、生产活动、教育以及重要人物的著述，被誉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

盛世修志，编修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而长远的作用。历史是现实之鉴，编修方志可以保存地方史料、归整地情信息、揭示发展规律、推介区域优势，其根本价值在于明是非、知兴衰，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值得借鉴的正能量。笔者认为，编修地方志要彰显地域特色、专业特色、时代特色，书写出存史价值大、可读性强的精品佳志。经过参加二轮区志、名村志的编撰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些初步的认识和体会，与同仁共享。

一、编修地方志要浓墨重彩、充分体现地域特色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地方志的魅力就在于“地方”上，地方特色是地方志首要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地方志一定要揭示出该地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因素所构成的本质特征。只有真正反映出其本质特征，才能真正体现出地方特色。

北辰区是天津市环城四区之一。从地理优势上说，北辰区地势偏高，是通往京津两地的黄金走廊；从区位优势上说，北辰区有着浓重的城乡结合部特点，既有工业、又有农业，既有城区、又有乡野。新中国成立后，辟有白庙、北仓、引河北三大著名工业区，成为国家和天津市的重要工业、仓储重地。改革开放后，北辰区城市化建设、卫星城镇拓展迅速，成为城乡建设的典范，这些都是北辰的亮点。从文化底蕴上说，北辰区是元明清代著名的漕运枢纽、皇仓重地，是我国南北文化交融之地，因而成为能工巧匠、名贤侠士荟萃之地。写出北辰区的独特环境、独具条件、独有内容，也就体现了其本质特征。因此，《北辰区志（1979—2009）》在制订和修改篇目时，注重反映北辰的地域特点，在章题和节题设置上均有所体现。例如，《农业》编中的“一村一品”章就设了专业村选介、特色农产品两节，《体育》编中“传统体育”章单设“花毽”一节，一目了然，点明了北辰区传统体育的优势项目。

为有效彰显本地区地域特征，编修地方志要注重挖掘整理本地区历史上的人文地理资料。例如，《北辰区志（1979—2009）》的《专记》中设“塌河淀探源”“北辰人民革命斗争史略”“北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附录》中设“媒体看北辰”等篇章，都较好地展现了北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由于深度挖掘出本地区旅游、文化资源，不仅充分展示了地区魅力，而且还对提高本区知名度、增强对外吸引

力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介作用，促进了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北辰区志（1979—2009）》有关旅游业的记述，王朝酒业旅游观光，度假庄园、乡村旅游、“农家乐”特色旅游等，不仅充分展示了本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更彰显了地区魅力。又如在第三十编《文化》中，将北辰区的文化特色品牌——“天穆杯”全国小品展演升格为一章编写，内容丰富、具体，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对有地方特色的事物，除了详细记述之外，还可以运用图表、照片、示意图等多种方式表达，使事物更加直观易读、形象鲜明。《北辰区志（1979—2009）》的《居民生活》编就运用了 8 张表、38 幅照片、18 幅示意图，另设 4 篇随文附，这种写法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是此志书的一大亮点。此外，第三十六编《人物》中除了将本区的名人贤士收录入志外，还专门设人物补遗一节，将北辰区贤达志士的风采记录下来，起到了很好的补充、拾遗作用，体现了本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编修地方志要精心筹划、着力突出专业特色

编修地方志，其内容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覆盖面广、工作量大、周期较长的特点。但是其编纂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不仅有创新的亮点，而且具有资政、参考、借鉴的功能。例如，在编修《北辰区文化志》过程中，将“天穆杯”小品赛、广场舞、青歌赛、《北斗星》杂志单设为节，将北辰区独有的文化活动显现出来，不仅宣传推介了本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突出了北辰的专业品牌和特色。又如《北辰年鉴》中的专记、特载、综述等类目的设置，把区情信息、重要文献及调研文章、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名录、北辰区的相关媒体报道等一一展现出来，具有资政、参考与借鉴的重要作用，也为服务当代、领导决策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又如《北辰年鉴》在附录后面增加了“为民服务”专栏，内设与民生相关的讯息以及北辰区委办局公开、服务电话名录等，极大地方便群众查阅、咨询，提高为民办事效率。坚持这种为现实服务的本质，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志书的质量与水平，也能更好地展现地方志的自身价值。

为突显地方志的专业特色，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应注重收集新、特资料。比如《双街村志》编纂过程中，注重收集双街鲍氏八极拳、双街村文化历史展览馆、天津石雕艺术博物馆、双街新邨社区农家书屋、双街葡萄文化节等新颖、独特的资料，使地域特色得以彰显。又如《双街村志》“幸福双街”里以随文附的形式记述了“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刘春海”，既说明了好书记的领头羊作用，又突出了其时代特征，可谓一举两得。在“艺文杂记”类目中，增加了有关双街村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内容鲜为人知，失传已久，编写时根据大量口碑资料对其进行了挖掘、整理，故事生动、具体，很有存史价值。

为突显地方志的专业特色，着力体现事物的完整性，在内容编排上还要注重历史与时代相结合。比如《北辰区志（1979—2009）》第十四编《商业》中，不仅记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居民购销粮食、凭票购买副食等情况，还记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应运而生出现的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商业街、专卖店、专业市场、商业中心等商品流通市场。前者挖掘、整理了历史资料，具有极高的存史价值；后者则彰显了时代特征，体现了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为突显地方志的专业特色，在编纂志稿时，还要借助新闻媒介，注重丰富史料内涵，进一步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利用新闻媒介手段，可以有效补充说明记述的正文内容，同时丰富史料内涵，更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把握其讲述的核心内容。比如《双街名村志》“现代化

都市休闲农业”这一类目中，记述了其亮点：双街村种养殖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正文后附媒体衔接：《感受北辰区双街村种养殖农业合作社首次分红》，这篇新闻报道绘声绘色地展现了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及给村民带来的各项福利待遇，使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的现代化示范农业发展之路。又如《天穆镇志》中的“天穆杯”全国小品展演部分，借助大量媒体链接，反映了该区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生命力和“天穆杯”全国小品展演在全国的影响力，增强了本区的文化软实力。

三、编修地方志要与时俱进、努力彰显时代特色

地方志的时代特点也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之一。地方志是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也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方志的一个重要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志充分发挥了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效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也不同于其他书籍、刊物，更突显了其著述性、时代性、科学性。

如在《双街村志》中，用“双街新城”“双街新家园”“双街新邨”“国耀上河城”等新兴社区建设，展现出北辰区双街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旧村改造的巨大成果和建设卫星城镇的农村新貌。用“双街鲍氏八极拳”“双街村文化历史展览馆”“天津石雕艺术博物馆”等历史文化资源和“双街盛世宝鼎”“紫御园”“古街”等园林建筑景观串联出“现代农村旅游观光”，展现出新时代新农村的文化生活。

《北辰区志（1979—2009）》着眼于详细记述改革开放，全方位彰显时代特色，力求将改革开放贯彻于全过程，除集中记述经济体制改革外，又在相关编章中记述了其他领域改革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例如，在第十八编《经济行政管理》中记述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内容，在第二十六编《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中记述了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的内容，在第三十一编《卫生》中记述了卫生体制改革的内容等等。这样可以扬长避短，有效地把握住记述重点。

北辰区地情资料丛书第十一辑《北辰知多少》

编修地方志可以为人们了解区情区貌提供便利。《北辰区志（1979—2009）》客观、准确、全面地记述了本区的地理状况、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风俗文化、生产活动、教育以及重要人物等方方面面的史料，便于人们了解区情区貌，更为领导决策提供翔实的参考、借鉴作用。同时利用编修二轮区志的契机，更好地开展学志用志活动，让人们了解历史、热爱家乡，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干劲儿与活力。北辰区方志办及时编纂了《北辰知多少》地情资料丛书，以真实准确的史料，翔实客观地记录了北辰区有史以来的建制沿革、重大事件、地理环境、人口特点、经济发展、文化特色以及英烈先贤等重点内容，是了解北辰历史、熟悉北辰区情、见证北辰发展，兼具资政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乡土教材，是一本史料丰富、形式活泼的读物。运用区志及地情资料丛书，北辰区方志办推进读史用志活动进机关、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顺利开展，在全区掀起读史用志的高潮。

编修地方志有助于帮助民众了解历史、认识家乡。为宣传历史人物，激励后人热爱祖国，奉献人民，存史资政，教化育人，北辰区方志办开展“弘扬中华优良传统，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把区志上的名人贤士人物简介制作成“北辰历史人物”流动展牌，走进社区、走进机关进行展览宣传，为北辰“创文”工作添光增彩。此次展出历史人物有晚清名将曹克忠、民族实业家衡耀庭、正兴德茶庄创始人穆兴永、老美华鞋店创始人庞鹤年、民国贤母徐肃静、外交家温朋久、革命先驱安幸生、登高英雄杨连弟等。通过此次展览活动，宣传了北辰历史人物，使居民群众知晓了北辰区“创文”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升了青少年的爱国爱家情怀，发挥了鉴今、资政、教化作用。

为进一步挖掘地情资料丛书等历史史料，激励人们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北辰区方志办将史志知识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在“育人”上下足功夫，开展了题为“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主题党课。在党课中详细介绍了历史上北辰区的隶属沿革、区名的由来、乡镇及街道的建置沿革等丰富史料，重点介绍了曾对北辰建设发展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物，如民国贤母温世霖、为中国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烈士安幸生、为北辰建设发展贡献毕生精力的老区长宋毅等，让党员干部更加了解家乡历史，热爱自己的家乡。通过主题党课，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党性意识，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了解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光辉历程，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起到了教

北辰区利用红色七月进社区活动，积极宣传推介北辰历史人物

北辰区卫健委依托一轮《卫生志》，精心打造北辰卫生事业三十年图片展

化、育人的重要作用。

编修地方志还有助于开展各种宣传教育等系列活动，积极服务思政教育。依托原有的志书、新闻报道等载体，挖掘、整理本单位光辉的发展历程。北辰区卫健委、北辰区财政局等单位不仅积极编纂二轮部门志，还依托原有的部门志、新闻报道等载体，精心整理、编辑改革开放以来卫生事业、财政事业图片展，既有文字记述，又有珍贵图片，图文并茂，直观生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卫生事业、财政事业发展历程及取得的荣誉，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不仅把志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同时也发挥了鉴今、育人、宣传推介等重要功能。

总而言之，编修地方志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地方志编修的过程，就是对时代特征、地域文化及历史变迁的全面了解过程，挖掘整理出的大量材料，是进行爱国爱乡、革命传统教育最好最生动的教材。编修地方志应牢牢遵循存史资政、教化育人这一性质和目标，紧紧围绕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和意识，在指导思想、记述内容、编纂重点、框架结构、语言文风、编辑水平、出版工艺等诸方面均体现其地域特色、专业特色、时代特色，不断书写出精品佳志，为现实服务、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地方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切实突显出来。

（作者单位：北辰区档案馆）

关于提高《津南年鉴》质量的研究与思考

蒋玉秋　张合德

《津南年鉴》2011 年创刊，内部发行，2018 年公开出版。十年来，《津南年鉴》坚持科学分类、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体现了津南区的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为宣传津南，建设津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十年的磨砺中，我们对年鉴编辑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创新中求发展，对做好年鉴编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做好《津南年鉴》编辑工作，对如何提高年鉴整体质量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思考。

一、早动手，多渠道，在收集年鉴资料上下功夫

《津南年鉴》是系统记述津南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全区 100 余个部门，具有综合性、系统性、信息性、连续性、权威性的特征。实践证明，收集年鉴资料是编辑好《津南年鉴》的首要任务和最基础的工作。要在年鉴资料收集上下大功夫，及早动手，采取多种方法，保证资料真实，内容丰富，行业齐全，为编辑工作奠定基础。

（一）及早部署收集资料

《津南年鉴》是汇集津南区上一年度区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等方面重大活动、横及百科的综合记述。年鉴资料主要来源是全区各个职能部门和主管单位，资料收集是否全面丰富，决定着《津南年鉴》的质量。为此，我们紧紧抓住每年年终工作总结的有利时机，向全区各单位下发《关于报送〈津南年鉴〉的通知》，要求在次年 2 月底之前完成资料的收集工作。通知发出后，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与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进行沟通，尽量使各单位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料收集工作，并且保证上报的材料内容齐全。对不能按时上报材料的单位，给予帮助指导，以保证年鉴编辑工作顺利进行。

（二）多渠道收集补充资料

有的职能部门收集的资料不能反映一件事物的全貌，需要几个部门从不同角度去记述。因此，在资料收集中，除了各单位报送的资料外，还要注重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补充，以便对事件进行完整地记述。一是有关跨部门的综合性资料，通过参加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以及有关部门联合组织的重大活动进行收集整理；二是有关全区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工作，深入到具体部门收集整理；三是区领导的重要活动、重要讲话，委托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办公室进行专题收集；四是有关全区的年度数据统计资料，每年由区统计局《统计年鉴》提供；五是年鉴中所

需彩页照片通过《津南时讯》、区融媒体中心、网信办收集整理。平时注意加强与这些部门的联系，主动与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沟通，明确专人负责，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一事一整理。

（三）认真审查资料

为保证收集的年鉴资料准确完整、真实无误，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审查签字后上报区档案馆方志科。区方志科由专人对年鉴稿件分类整理，对漏报单位进行催报补报，重点单位由馆领导与所属单位领导联系沟通，完成年鉴资料收集整理。对已上报资料，按照分工逐项审查，发现有遗漏内容，提出补充意见，进行补报，保证年鉴资料内容丰富，事项齐全完整。最后，由《津南年鉴》主编全面审查，提出编辑意见和建议，再由编辑人员排版整理后进行补充完善。

二、勤思考，多研究，在体现年鉴创新上做文章

年鉴创新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家康先生曾说过：“年鉴不创新，将不会有读者、不会有市场、不会有活力、不会有前途。”一年一鉴，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每年都是老内容、老样子、老面孔。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在保持《津南年鉴》基本框架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编辑中努力做到，勤思考、多研究，在体现年鉴创新上做文章。无论是年鉴内容、篇目设置，还是版式编辑、封面装帧，做到年年有变化、有新意，增强可读性和观赏性，使《津南年鉴》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提高。

（一）调整和改进框架设置

年鉴框架是全书内容的总体设计，承载资料的主体骨架，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可变性的特点。《津南年鉴》在框架设置上始终坚持三个原则：整体基本稳定，框架服务内容，内容突出创新。多年来，《津南年鉴》基本保持了区情要览、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民主党派与工商业联合会、人民团体、法治、军事、区域经济、招商引资与区域经济、财税、经济管理、园区建设、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事业与人民生活、镇街（办事处）建设、光荣榜和附录等固定篇目。紧密结合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研究，认真思考，共同探讨，在框架创新上做文章，要求编辑人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捕捉时代信息。年初及时组织编辑人员对篇目进行分析、归类、增减，力求达到篇目科学、覆盖全面。利用特载形式刊发当年《政府工作报告》及重要会议有关内容，利用图片集中反映全区上一年度的大事要事。根据变化情况对栏目进行调整和改进，从年鉴框架上，尽量淡化老内容、老样子、老面孔，突出新内容、新变化、新特点。

（二）丰富和完善条目内容

年鉴框架结构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是为内容范围和选材方向服务的，以提升年鉴资料的分类归属和层次，方便读者阅读、检索。年鉴的框架和条目很重要，内容真实，让读者看得见摸得着，不能空洞无物，要有实实在在的丰富内容。在不断调整和改进年鉴框架设计的基础上，注重提炼条目标题，丰富条目内容。每年年鉴资料收集后，编辑人员进行分析研究，及时捕捉时代信息，特别关注新的内容资料，使条目内容体现“全”“新”

“精”“特”。“全”就是年鉴框架齐全，内容完备；“新”就是内容表述新颖，有新鲜感；“精”就是语言文字精炼，简明扼要；“特”就是有特色，有特点。例如，在2018年和2019年提出为大事立条、为新事立条、为特事立条、为热门话题立条，突出反映了津南区在高质量绿色发展、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三）提高照片质量和装帧

年鉴照片的选用和装帧是一项艺术性很强的工作，是提高年鉴质量的外在表现。一部年鉴内容再充实，如果缺乏高质量的照片和完美的装帧，难以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关注。《津南年鉴》每年在这方面都付出很大精力，注重彩页照片的收集整理和选用，反复筛选，力求达到完美。每张照片选取都具有代表性，并注重艺术观赏性，通过彩页照片让读者对津南区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把读者吸引住。例如，《津南年鉴》彩页选取了一张反映津南区发展的照片——数字津南，并配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数据。之后选取了重要会议、经济建设活动、魅力津南、文化活动、社会事业等专题照片。年鉴中随文照片很重要，尽量做到：一是数量多；二是必须与文字密切相关；三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四是照片观感性好。年鉴封面的装帧设计也很重要，常言说“三分编辑，七分装帧”。为此，我们每年都要设计三四种封面样式，征求区级领导、专家和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综合意见建议后拍板定案。

三、找亮点，多记述，在突出年鉴区域特色上重笔墨

在编辑《津南年鉴》时，注重对资料的收集分析整理，科学选用，选取能反映津南区亮点的资料和事例，充分利用，在突出津南区地域特色和特点上重用笔墨，反映津南区的新变化、新发展，使《津南年鉴》更好地介绍津南，宣传津南，为津南的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一）注重编辑好区情要览和大事记

区情要览和大事记，作为独立篇章，居年鉴卷首，起着概览总况、引领全书的作用，是集中反映津南地域特色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年鉴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特别重视编辑好区情要览和大事记。区情要览文字不多，五千字左右，有十五六个条目，将津南区行政区划的建制沿革、地貌气候、人口民族、历史名人以及交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事业等，用最简短的语言文字介绍给读者，做到条目紧凑、言简意赅，使读者对年鉴的整体内容和津南区的地域特色有基本的了解，具有独特的提示性和便览性。大事记文字不宜过多，但可以提纲挈领地记录具有存史价值的重要事件，能画龙点睛地展示出重大事物的发展进程，勾勒出发展轨迹。在编辑时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必写；反映年度特色，使年鉴内容具有时代性。在大事记的创新上做到：突出选材客观性；增强资料准确性；提高表述规范性。

(二)丰富区域经济和园区建设等经济栏目内容

区域经济和园区建设等经济栏目是《津南年鉴》的特色篇目，是集中反映区域特色的重要部分，也是津南区经济发展的集中表现。近几年我们十分重视这类栏目的编辑，用大量数字和事例进行记述，丰富栏目内容。例如，

《津南年鉴（2019）》特色篇目记述了津南经济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以及双港、海河、八里台、小站四个示范工业区等情况，表述内容都具有区域特色，反映了津南区年度内经济发展和创新情况。在编辑特色篇目时，要不惜下功夫，用精力，重笔墨。一是对各单位报送的资料尽量多选用，重要内容资料不漏掉；二是多用数字反映问题，认真核对数字是否准确；三是栏目标题突出，内容集中；四是多选用一些照片，尽量不受文字和页面限制；五是科学设置、合理安排，创新内容和重要事实放在前面。同时，根据津南区土地整合、各镇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许多自然村已不存在，出现了新规范化的农村现代化社区。在镇街（办事处）建设栏目里，把各镇的城镇建设、农村整合拆迁和社区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单独设置标题。

（三）切实记述好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

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是年鉴的重要内容，是《津南年鉴》的亮点和区域特色的突出表现。在编辑时要不惜用重笔墨记述全年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内容，从不同角度反映津南区的新变化、新发展。例如《津南年鉴（2019）》，首先，在年鉴大事记栏目对津南区的重点工程和重点工作认真记述，做到不漏记。其次，对国展中心建设、津南区绿色森林屏障建设、葛沽镇城市综合开放 PPP 项目建设等重大项目，从项目规划设计、资金安排支持、组织实施以及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细记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津南区“双万双服促发展”、创建文明城区、文明家庭大讲堂、文化艺术演出、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等重大活动也都做了详细记述。

四、稳队伍，多培养，在提高年鉴编辑人员素质上用力气

年鉴编辑的好坏、质量的高低，编辑人员是关键因素。编辑人员必须具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加工能力和政治鉴别能力，必须熟练掌握编辑年鉴的基本知识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区档案馆十分重视编辑队伍建设，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编辑队伍整体业务水平。

（一）加强在实践中提高业务水平

为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要重视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一是每月一次或不定期组织编辑人员学习本系统有关年鉴的工作指示、文件，学习年鉴编辑的基础知识，掌握基本要领，特别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年鉴编辑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是每月进行 1 到 2 次集中交流，根据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共同提高；三是鼓励个人平时坚持学习业务知识，每季度布置个人自学内容并进行检查，每半年进行一次业务知识交流汇报会，提高编辑人员学习业务知识的自觉性、积极性。

（二）积极参加本系统组织的业务培训

年鉴知识业务培训是提高年鉴编辑人员整体素质的重要措施，是系统全面学习年鉴编辑知识、提高编辑水平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市档案馆（市方志办）每年举办的年鉴业务知识培训班，聘请年鉴编辑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对提升年鉴编辑业务水平、提高年鉴编纂质量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津南区档案馆）

天津方言的移民基因

郭凤岐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所谓“五方杂处，率多流寓”。每个人都有个“你从哪里来?”的问题。历史上，天津中心城区的原住民很少，金元时期，主要集中在 3 处：一为三岔河口，蒙古太宗六年（1234）高松、谢实等 18 人奉旨造盐；二为大直沽，元代已有聚落，从事造盐、酿酒业；三为侯家后，元代“已有沿河之滨结邻而居者”，乾隆时举人李是，83 龄铁汉子，就是五百余载旧人家之后。但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如《天津卫志》所说：原住民“日见凋零”。

从元代开始，天津的移民便与日俱增。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辟海漕，始点港是江苏太仓刘家港，终点港是大直沽。直沽呈现出“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的景象。尤其是东庙、西庙等妈祖庙相继建立后，直沽的繁华愈盛，“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此时，在直沽的移民人口中，江淮人占有一定比重。这从元代傅若金《直沽口》诗中可以得见：“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这里的“吴歌”，指吴地人的口音。而吴地，包括今之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一部分地区。

明初，天津移民得到爆发性发展，而且以宿州为中心的江淮平原移民占有很大部分，天津中心城区的方言，由此形成。

天津方言称为“方言岛”。天津“方言岛”，也可称为“方言角”，它是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边东起东丽区的赵庄子，向西穿过河北区、红桥区，至西青区的曹庄子。三角形的顶端，位于津南区的大韩庄，顶端距离底边约 25 公里。从顶端向东北至赵庄子，向西北至曹庄子，是三角形的两个腰。三角形之外的北、东，南、西，被武清和静海方言区所包围。

那么，以宿州为中心的江淮人，是如何移民天津的？占天津移民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呢？

一、燕王扫北带来大量江淮移民

明建文元年（1399），因削藩一事，燕王朱棣与南京朝廷矛盾迅速激化，燕王朱棣由北平兴兵，开始了“靖难”之役。燕王初起兵之时，势小力弱，举步维艰。而南京朝廷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

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将北平周围的朝廷势力全部扫清，由此燕军兵力增至数万。

建文元年（1399）八月，朱允炆起用年近古稀的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军 30 万伐燕，分别进驻真定和河间、鄚州（河北任丘

北约 30 里）、雄县，形成掎角之势。

当时，被朝廷认为“以卵击石”的燕军，却以少胜多，先后突袭了雄县，剪除了河间、鄚州两翼，打破了真定的固守，朝廷的第一次伐燕失利。朱棣从而壮大了军力，稳定了后方。

接着，朝廷令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军 50 万（号称百万），再次伐燕，兵峰直指北平。建文元年（1399）十一月，燕军在白沟河、郑村坝一带进攻南军。朝廷大军虽兵力较盛，但寒冷难耐，加之李景隆指挥无方，结果再次大败而归。此战，南军损失 10 余万人，数十万人的辎重全部留给了燕军。燕王两次战胜朝廷军队，军力大增，势力更强。

建文二年（1400）九月，朝廷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组织了第三次伐燕。南军屯兵德州，以遏制燕军南下。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则入驻沧州，又是一波掎角攻势。朱棣假装下令征讨辽东，诱使南军北进。暗中却在直沽修桥渡河，当南军三方调动之时，燕军于十月二十七日直下沧州，将南军主将徐凯擒住。进而，朱棣进逼东昌（今山东聊城）。燕王以为掎角已破，也会如前两次那般顺利击败南军主力。然而没有想到，却被盛庸掉头团团围住，并用火器和弓弩肆意屠杀燕军。也许因为朱允炆有“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旨意，拟或为了引诱燕军陷入包围，朱棣数十骑兵，硬是没有被杀尽而获救。此役燕军损失精锐数万，大将张玉战死，朱棣遭遇起兵以来最大挫折，燕军形势陷入困境。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出师。三月，进行夹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附近，漳河支流）、藁城会战。夹河之战，开始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朱棣再次利用禁杀之旨，突破南军包围。随后，突然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南军顶着风沙，没法作战；燕军乘风而进，左右翼强横击杀，致南军大败，损失了数万人。

接着，朱棣进军真定，于藁城遭遇南军，于是两军摆阵交战。由于南军的火枪和弓弩厉害，大量燕军被其所伤，朱棣的帅旗也被射得像刺猬一样。但由于禁杀之旨，朱棣本人却安然无恙。次日，在两军交战正酣之际，突然又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南军不支，大败而去。燕军四面围攻，斩南军 6 万余首级。

从建文元年（1399）八月至建文三年（1401）三月，朝廷大军 3 次伐燕，一次夹河、藁城会战，其投入的总兵力不会低于百万。由于战斗中屡屡失败，南军的士兵，有的归顺燕军，有的被杀，有的南逃，有的落地，成为燕赵移民，而这些移民的数量应以几十万计。

这些南军的大量移民，都是哪里人呢？

据《太宗实录》卷八载：建文三年（1401）八月，燕军围困易州之“西水寨”，该寨“薪水不乏，所缺者粮儿”。由于“时围寨久，敌军多南人，天寒衣薄，会夜霜月。上（朱棣）令军中四面皆吴歌，敌军有潜下寨降者，言：‘众闻歌声，皆坠泪思归，无固守之态，但为房昭等所制耳。’”这个故事，说明南军中大都为吴地之人，而其中江淮人又占有相当比重。

二、燕王南下宿州大捷降者无数

燕军因东昌之败，此后南下，不再走山东

德州一线，而选择今京广与京九铁路之间的路线。建文三年（1401）冬，朱棣决定不再与南军盛庸、平安等纠缠，直接率兵南下，直趋京师。十二月十二日，燕军到达蠡县。建文四年（1402）正月，先后击败德州派出的一支分队和平安的部队，燕军长驱直入馆陶，并在馆陶渡河；随后，连克东阿、东平、汶上；又陷沛县，进入江苏；正月三十日，燕军先头部队到达徐州。建文四年（1402）二月，南军将领何福、平安、陈晖进兵济宁，盛庸进兵淮上。燕军击败徐州的出战部队，致徐州坚守不出，朱棣遂不再理会，继续南下。三月初一，燕军进逼安徽宿州。随后，抵达涡河（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以北）。南军平安见燕军一路南下，带兵来追，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设伏兵之计，只得退回宿州。当燕军进达睢水之小河、正搭设浮桥时，建文军的平安、何福分两路夺桥，双方隔河相持。数日后，朱棣半夜渡河偷袭，因南军徐辉祖援兵赶到，双方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宿州齐眉山（灵璧县西南三十里）开战，结果南军大胜。

在燕王军心不稳、是进是退的犹豫之时，朱棣坚定了燕军再战的决心。此时，朝廷讹传燕军兵败，遂召徐辉祖回师京城，致使南军何福与平安的部队削弱，只得在灵璧筑深沟高垒，作长远之计。由于南军粮道被燕军阻碍，平安亲自率兵 6 万护卫粮草。四月二十七日，朱棣率精兵乘机袭击平安，将其一分为二。在平安部队危机之时，何福出兵救援，却被燕军伏兵打败。因南军缺粮，致使何福、平安决定四月二十九日突围，号令为 3 声炮响。巧合的是，此日燕军攻打灵璧墙垒，其进攻信号也是 3 声炮响。而南军误以为是己方号炮，纷纷夺路而逃。燕军趁势进攻，使南军全军覆没。宿州之灵璧大捷，燕军生擒平安等 37 员敌将，4 名内官（宦官），150 员朝廷大臣，获战马 2 万余匹，降者不计其数，只有何福单骑逃走。此后，燕军在长江以北，再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宿州之灵璧战后，燕军向东南方向直线前进。攻下泗州，取道淮安、凤阳受阻后，遂克盱眙，到达天长（扬州西北 50 公里），扬州不战而降，随后高邮归降。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投降，燕军驻扎于龙潭（距京师金陵东约 30 公里），朝廷大震。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2 年 7 月 13 日），燕军抵金陵，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橚和李景隆，开门迎降。燕王在群臣拥戴下，即皇帝位。

三、天津三卫官员中江淮籍最多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载：永乐二年十一月（1404 年 12 月 23 日）“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永乐三年（1405），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卫是军事建置，天津三卫都由后军都督府统辖。每卫足额兵士 5600 人，三卫足额兵士共 16800 人。三卫衙门均设在卫城内。卫所兵士的职责主要是戍守和屯田，约三分之一兵士，在卫城戍守；约三分之二兵士，分散在南运河两岸卫城至沧州的 143 个屯堡屯田。

康熙《天津卫志》“户口”中，记载了官

籍 308 口（有的资料说 309 口不确）。这 308 口官籍，不是清初的户口，而是天津三卫各级官员的籍贯。理由是：

其一，《天津卫志》有说明云：“卫自屯所圈拨之后，日见凋零，司民牧者当以滋培招徕为首事。志户口。”

其二，户籍中，笔者查出了多位三卫官员。例如：

官籍中第 189、梅满儿（江苏武进人），是永乐年右卫首任指挥史，正三品。

官籍中第 30、倪宽（邳州人，即江苏徐州），是正德朝左卫指挥史，正三品，他是永乐年左卫指挥史倪兴的后人。

官籍中第 53、张通（开封人），是永乐年指挥佥事，正四品。

官籍中第 297、倪玘（安徽全椒人），是宣德元年左卫指挥史，正三品，他是倪兴后人。

虽然，燕王扫北带来大量江淮移民，燕军宿州大捷亦有众多降者为江淮人。但是，两者都没有江淮人的具体数量。通过对天津三卫各级官员的籍贯详加核查、分析后，就可得见天津移民具体来源之一斑。

据笔者查考，此 308 个官籍户口，来自 151 个州县。其中最多者是安徽，计 87 口（中有宿州籍 4 口）；其次是江苏，计 47 口；缺籍 13口。安徽与江苏合计 134 口，占 308 口的 43.5%；占有籍者 295 口的 45.4%。这就是说，在明代卫官中，安徽、江苏的户籍几乎占了一半，基本皆转为民籍，作为天津的移民。

而且，三卫官员来天津，与士兵和一般移民不同，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或一个家庭。就官员所带队伍的兵士来说，往往与官员的籍贯是一致的，故在三卫士兵中，安徽、江苏籍几乎占了一半。他们转为民籍后，亦成为天津的移民。

从卫官家庭来说，其家族繁衍，对天津增加江淮移民，也是很大优势。以梅满儿为例。

梅满儿是朱元璋最器重的驸马，“托孤”重臣梅殷的曾孙。梅满儿原名梅满，朱元璋赐名梅满儿。他任天津右卫首任指挥使，遂入卫籍。三卫指挥史是世袭。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梅满儿后代有梅长茂（宣德朝）、梅宪（景泰朝）、梅瑞符（成化朝）、梅济（弘治朝）、梅定甲（嘉靖朝）、梅鼐（嘉靖朝）、梅嘉实（隆庆朝）、梅时（万历朝）、梅友松（泰昌、天启朝）、梅守成（泰昌、天启朝）、梅应武（崇祯朝）。在明代，梅家世袭右卫指挥使共 12 代。

清顺治四年（1647），对天津卫的主要官员取消了世袭制，改由上级委派“守备”担任。但天津左、右卫仍为世袭。到顺治九年（1652），三卫合并后，结束了卫所官员的世袭制。

清代，梅家由尚武改为崇文，出了梅履端、梅成栋、梅宝璐等文化大家。

到民国时期梅贻琦的下一代“祖”字辈，在 500 年间，天津梅家从第一代的梅满儿，繁衍至第 20 代、分为 4 大支系、成员几百人的大家族。

江淮移民在天津的剧增，成了天津移民城市的人口主流，形成了天津方言近似宿州方言区的基因特点。这就是天津方言的移民奥妙。

（作者：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张伯苓参选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之争

刘志凯

近期阅读史料，偶然看到关于张伯苓参选国民大会代表的一件公案，甚觉值得回味。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海军士官生，因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1903 年随严修赴日考察教育，1904 年创办南开中学。1917 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教育，研究私立大学的组织方式。1919 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 50 万银元，张伯苓在天津西南八里台一带购地 400 亩，创办了南开大学。1923 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 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私立教育体制。1936 年在重庆成立南渝中学。1938 年任国民参政员并当选为副议长，1945 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 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 年 11 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是名义上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国民大会根据孙中山“权能分治”的理论设计。首届国民大会原定于 1936 年召开，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1936 年内，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并进行了代表选举（有部分省区未完成）。但因抗战爆发，原定当年召开的国大不得不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 年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为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当即悍然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追随他的只有从中国民主同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首届国民大会于 1946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举行，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制宪国大”。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于 1948 年召开国民大会，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因此，1948 年国民大会又称“行宪国大”。1947 年 11 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国会议员直接选举，各省分别于11月21日至23日举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被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报经中央党部，提名为天津市国大代表区域候选人并成功当选。时任国大代表候补人富健康（49岁，天津人，医生，住一区山西路77号）对此提出质疑，于11月26日致函天津市选举委员会，表明“今年元旦公布《宪法》第28条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第8条均明文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于其任所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查今日报载公布天津市区域代表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身为公务人员，是否利用其任所所在地种种便利当选代表？按《国代选举罢免法》第5章规定：‘资格不符当选无效。’如何之处，请于3日内答复，以便向法院提出选举诉讼。请勿延误为要”。

为此，天津市选举事务所于27日、28日连续两天向南京选举总所发出特急密电，将调查情况进行报告。电文中称“现本市国大当选人张伯苓系国立南开大学校长，据称仅接教育部令私立南开大学令文，南开改为国立，仍以张伯苓为校长，但本人并未奉到政府简派状或聘书”。

天津市选举事务所做事也算周到，在未得到南京方面答复的情况下，29日以选务科名义先给富健康回函进行安抚一番。信中写道，“径启者，奉交下台端函一件，为张伯苓当选国大是否有效一案。奉批：查张伯苓系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向选举总所提名转送本所者，该案刻经电请选举总所核示。一俟复电到后，再行函复。等因。相应先行函请查照为荷”。

12月3日，南京选举总所终于特急回电，“如果张伯苓未经政府委派，自不受国代选罢法第8条规定之限制”。

大概是对张伯苓是否得到南京政府任命仍不敢确认吧，12月4日，天津市选举事务所主席委员杜建时又分别向南开大学、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发出查照、质询公函。得到的答复基本是一致的，其中，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一、南开大学原系私立，此次改为国立，原定为期10年，期满仍恢复私立，与国立大学性质不同；二、南开大学暂改国立后，张伯苓先生并未经国府任命为国立大学校长，目前仍以私立大学校长资格处理校务”。

对此，富健康是不认同的。不待天津选举事务所正式回复，他在11月（日期不详）就将天津市选举事务所和张伯苓作为被告起诉到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12月15日，天津市选举事务所做出答辩。笔者不知道开庭或者调解情况如何，1948年2月，富健康撤回诉讼。至此，这段公案终于平息下来。

关于南开大学从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过程，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据史料记载：

南开大学由张伯苓和严修创办。1919年2月10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1923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了12.5万元，河南企业家袁述之捐助了7万元。1927年，湖北企业家卢木斋捐助10万元。南开大学依靠这些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逐步扩大办学规模，完善学校设施。不过，由于私人办学的力量有限，南开大学的规模始终不大，到1937年，南开大学在校学生仅427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历经周折，迁移到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里，只有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由此可见，南开大学办学质量是非常高的。不过，南开大学加入西南联合大学，也是这所学校的命运转折点。

众所周知，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一直都非

常紧张。从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多次拨款予以支持。《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披露了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校后，南开大学转变成公立大学的过程。

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及党国要人，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

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不久，蒋介石就兑现了诺言。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

安淑萍的《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一文记载，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又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政府公款补助超过了45%。

1936年初，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蒋介石当即表示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蒋介石做出了表率，国民政府大员纷纷效仿，以示捐资助学之慨。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南开这个抗日大本营进行野蛮轰炸，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标志着南开由私立大学向国立大学转型。1938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汉口约见张伯苓，并邀其共进午餐。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

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支持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精神到金钱，从健康到生活，蒋介石对张伯苓的优遇，可谓无微不至。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的南开了。

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就在蒋介石签署文件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之前，张伯苓还想继续维护南开的私立性质，并对此充满信心。在三校复员之前，他将南开教育经费的设想致函蒋介石，并与蒋介石面谈。但这只是张伯苓的一厢情愿，教育部已经为南开大学拨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让南开姓“私”。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校史与地方史研究专家梁吉生对此评论说：“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蒋介石鼎力支持张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张伯苓作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南开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号召力。抗战时期，张伯苓在政治上给予蒋介石坚定的支持，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

1946年，当南开大学从云南昆明迁回天津后，改名为“国立南开大学”。从此，世上再无“私立南开大学”。

（作者单位：南开区档案馆）

天津集贤书院沿革述略

李琦琳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天津三取书院创办，至清末陆续又创办了问津书院、辅仁书院、会文书院，这些书院主要招收天津籍士子入学。为解决旅津人士子弟求学问题，集贤书院应运而生。关于该书院，今人著述多有提及，大多相对简单，甚至有误，本文就集贤书院的沿革略述如下：

一、集贤书院的成立及办学情况

集贤书院成立于1886年。1899年版《重修天津府志》对其初建情况，有如下记载：

集贤书院在天津三岔河口水师营东。光绪十二年，运使（即长芦盐运使）季邦祯、津海关道周馥、天津道万培因会详总督兼盐政称：津门地当孔道，冠盖云集，凡随任子弟与夫幕友侨寓者，宜加培植，俾成有用之材，拟创建书院一区，颜曰“集贤”，为外省举、贡、生、监肄业之所。每月两课，于制艺、试帖外，兼课经文、经解、策论，并诗、赋、骈、散、杂文以及天文、算学、时务，每年除正、腊两月停课外，由督院、运司、关道、天津道各课两月，天津府、县各课一月。轮应何署主课即由何署筹发奖银。其建造经费，由籍隶外省各官集捐建成。[1]

关于集贤书院成立之后的办学情况，《申报》的报道可作有益补充。

一是《申报》1887年10月12日《津门杂志》载：“集贤书院创于去春，专为培植外省人材而设。于时经费未敷，暂假问津书院命题课试。今岁，由司道各宪筹捐巨资，于河北购地一区，鸠工庀材，起盖书院。现在，规模粗就，加以丹垩，设以藻缋，便可焕然一新。”可见，集贤书院创办之初，暂借问津书院（设在鼓楼南街）办学，至1887年秋冬，新址建成使用。

二是《申报》1888年5月22日《津郡纪闻》载：“集贤书院系为培植外省人才而设。每月朔望，自傅相（即直督李鸿章）以及司、道、府、县，轮流主课，有条不紊，法至善也。本月朔日，轮应津海关道课期，缘周玉山观察公出未归，由五月主课之天津道胡观察，提前考试，下月再由关道补课。其应考之举、贡、生、监仍照向章，取具同乡官印结，报名与考。”可见，集贤书院授课严格，主讲人水准也是很高的。

三是《申报》1889年7月25日《津郡决科》载：“每届大比之年，直隶督宪李傅相，嘉惠士林，例有决科之举。本年恭遇恩科，除外省寓津士子已在集贤书院扃试外，其三津人士之鏖战秋闱者，示期于二十日在辅仁书院考试，札委天津府汪子常太守监场，拟踏槐黄者，无不摩厉以须。”1889年为乙丑恩科，在集贤

[1]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南开大学出版社，第996页，1999。

等书院举办的应为乡试。

二、集贤书院是否做过北洋高等学堂

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一度推行教育改革。当局打算把集贤书院建成北洋高等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谕旨宣告：“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1] 光绪的上谕发布两个月后，直隶总督荣禄上奏折称：“天津为北洋大臣驻节之所，亦与省会无异。大小书院，共有六处。内集贤书院专课外省士子，辅仁、会文、问津、三取、稽古五书院，专课本地士子。膏火奖赏，除地方商民捐办外，均系官为筹给。今拟将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无论本省外省士子，均准入选。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拟即归并，分别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各一所。学有成就，升入高等学堂。”[2] 故今人著述据此称：“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3]

不过，荣禄奏折并不意味着集贤书院此后已改制为了北洋高等学堂。

一是《申报》1898 年 9 月 29 日《书院改章》载：“天津访事人云，津郡书院共有五处，惟集贤书院，外省之举、贡、生、监皆得与试，其余会文、辅仁、问津、三取四书院，皆专课天津士子。自奉旨改书院为学堂，官绅屡次集议，现已酌定，将集贤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会文、辅仁改为府县两学堂。然学堂肄业诸生，额数有定，则未入珊网之遗珠，不免有向隅之憾。因仍留问津、三取两书院甄别生童，专课策论，俾未入堂之诸士子，亦得应课。本月初三日，已由北洋大臣札委王菀生观察（即王修植）详查，拟改学堂之各书院产业，并由运宪归并，三取、问津两书院生童，于初四日甄别。”

二是《申报》1898 年 11 月 10 日《复试八股》又载：“天津访事人云，日前，奉旨变法自强，天津集贤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辅仁、会文等书院改为府县学堂，专课中西实学，惟留问津、三取两书院，以策论课寒畯之士，俾免向隅。现在，此举作为罢论，所有月课仍试以八股，试帖各一首。惟集贤书院向试经古，目下，兼课策论，然亦以无足轻重视之。变法之难，于兹可见。”

以上征引《申报》所载表明，直隶总督荣禄跟风意味过于明显，拿集贤书院说事，就是先向维新派表了态再说。但不久就风云突变，受戊戌变法失败影响，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的动议，并未付诸实践，属于无疾而终。此后，集贤书院照旧“复试八股”。

不过，当局之所以敢把集贤书院摆上台面，向朝廷报告改良学务意向，也是因为集贤书院占地规模较大，硬件设施较为完备，办学条件较好，能拿得出手。

三、从集贤书院到北洋官报局

白崇厚《集贤书院觅踪》一文最后得出以下结论：“至 1902 年时，集贤书院的旧址还在，只是兵灾后残破了些。”[4] 实际上，1900 年

[1] 原载《清实录·德宗实录》卷四百二〇，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04 页。转引自王喜旺著：《教育家张之洞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81 页，2016。

[2]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445 页载，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1898.9.6）荣禄奏折，1986。

[3] 白寿彝总主编；周远廉，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64 页，2015。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编：《天津河北文史》（第 1 辑），第 52 页，1987。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天津官绅四处呼吁保护教育设施，竭力反对西方列强占用校舍、伤及无辜。天津都统衙门不得不采纳津绅意见和建议，于 1901 年 3 月 2 日发布告示[1]，对集贤书院等天津六座传统书院采取保护措施。可见，集贤书院幸未因这次惨绝人寰的战乱而遭到灭顶之灾。1902 年 8 月 7 日，天津都统衙门布告称：“照得本都统等现奉各国统帅饬，于华历七月十二日，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地方官员办理。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2] 8 月 15 日，袁世凯（字慰亭，尊称慰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接管天津都统衙门权力，并把直隶总督衙门正式设在天津新浮桥（今金钢桥前身）桥头的海防公所。此为集贤书院分开新局面的重要历史契机，在此之后，集贤书院的身份不断变化。

（一）北洋大学选址集贤书院

1902 年 6 月，津沪报章披露北洋大学堂将利用集贤书院复校的消息。

如：《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0 日《纪北洋大学堂》载：“都署汉文司员丁家立君，经大府聘为直隶全省学堂总教习。丁君已将汉文案差辞卸，前往保定，迭见津报。兹悉丁君到保后，与慰帅面商诸事，尤以重建北洋大学堂为急图。慰帅准如所请，顷已电达津关道，饬将集贤书院赶紧清理，以备将来建堂兴学之用。”

又如：《申报》1902 年 6 月 28 日《重办学堂》一文亦载：“天津友人函云，直隶全省学堂总教习丁君家立，日前赴保定面见直督袁慰帅，商办事宜。丁君以重建北洋大学堂为请，慰帅韪之。业已电饬津海关道，将集贤书院赶紧清理，以备改作学堂。”

此为北洋大学堂选址集贤书院的肇始。北洋大学堂 1895 年初创时担任总教习的丁家立，当时在八国联军在津设立的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担任汉文文案（包括翻译）等工作。1902 年，天津政局趋于稳定，丁家立主动辞去在天津都统衙门所任的职务。1902 年 5 月 14 日，天津都统衙门《第 291 次会议记录》载：“丁家立先生要求本委员会准许他辞去汉文秘书职务，以便从事教育工作。根据丁家立先生对本委员会所做出的出色服务，同意他在离开临时政府前预支两个月工资。本委员会向丁家立先生面交一封感谢信。”[3]检《袁世凯全集（第 10 卷）》，在 1902 年 4–5 月份的《保定迎驾各洋人名数清单》中载：“直隶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人丁家立，教习美国人白来晏，教习美国人裴护卫。”这表明，在辞职前后，袁世凯已授权丁家立负责振兴直隶教育。丁家立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直隶全省学堂总教习的消息也被媒体披露：“直隶学堂总教习丁家立氏云：袁宫保拟将直隶全省遍设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小学堂止习中文，不习西文。中学堂兼习西文。大学堂分课各项专门之学或各国文字。”[4]

由于对北洋大学堂感情很深，丁家立力主尽快复建北洋大学堂。此动议得到袁世凯的首肯。而集贤书院具备办学条件，且在津海关道

[1]刘海岩等编：《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811 页《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 50 条载：“照得会文、辅仁、集贤、问津、三取、稽古书院，系归本衙门保护，各项人等均不准前往搅扰。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2004。

[2]原载张霭亭著：《双青藤馆手录本》，转引自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 6 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 571 页，2009。

[3]刘海岩等编：《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第 665 页。

[4]《大公报》1902 年 7 月 6 日《译件》，援引《京津七日报》所载。

的管辖之下，易于袁世凯掌控，遂成显而易见的新校址首选。

直到 20 年后，这个历史细节仍见诸报端。1922 年，《大公报》旧事重提，即："袁宫保电津关道，饬将集贤书院赶紧清理，以备重建北洋大学堂之用。从丁家立之请也。"[1] 可见，《大公报》是将北洋大学堂复校选址集贤书院一节，作为该报记载于 1902 年 6 月 20 日的中国大事记录在案的。

（二）集贤书院被临时征用为防疫医院

1902 年 6 月，袁世凯决定把集贤书院辟为北洋大学堂新校址的同时，集贤书院在保持原有课士功能前提下，辟出部分院址改作他用。

《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2 日《医院纪闻》载："南绅孙君仲英，邀同本埠众绅董及各善士富商，集资十万两，禀明都宪，分立医院十一处，各情迭经登报。兹闻，医院地基均已择妥，计：河北狮子林集贤书院、吴楚公所，西北隅文昌宫、如意庵、浙江会馆、育婴堂、同善堂、崇福庵，河东万益当、白衣庵，西沽大寺等处。"6 月 24 日《开院施医》又载："本埠创办保卫医院，屡纪报章。兹闻，保卫总局及集贤书院、浙江会馆、文昌宫、府署内、侯家后女医院内各分局共六处，业经开办施治，每院各有华医诊疾。日来，贫寒士民之赴院求诊者纷纷不绝。"当局为何如此急迫地在天津遍地设立临时医院？

原来，京津保地区当时已暴发霍乱，且属大流行级别。此次疫情始发于塘沽。《大公报》6 月 18 日披露："津郡时疫流行，传染甚速。"《大公报》6 月 25 日《时疫流行》又披露，保定也已发现霍乱，即："近日，省城染患时疫者为数甚众，因疫致命者亦时有所闻。"

京、津、保三地咫尺之遥，疫情汹涌，不能不引起官方的高度警觉。各界有识之士马上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天津方面行动迅速："东西各界设法预防，实已造福地方不浅。乃津人疑神疑鬼，谣言繁多，愚夫之愚，亦何可笑？兹闻，某君深悯华人愚陋，且于卫生之学，素未讲求，于日前纠合本埠各洋行商人，聚议筹款，创设施医院八所，在西头、河东、河北等处，分段设立，以惠津人。"[2]

这表明，在集贤书院设立保卫医院的急迫性更大，其他事情即便再重要，也都应毫无理由地为之让路。

疫情毕竟是暂时的。疫情稍缓之后，集贤书院一度恢复原状，不仅作为考场，且能接待外埠官员莅津住宿。但这都是暂时的。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当局重新规划，把集贤书院改作他用。

（三）北洋官报局整体迁址集贤书院

直隶官报局（后改称北洋官报局）当时已在保定创办，虽然屡经袁世凯催促，但报纸一直没有出版。谁都没有想到，官报局居然从保定整体迁至集贤书院，而且又对集贤书院实行了改扩建。集贤书院缘何改成了官报局？下面先梳理一下《大公报》对官报局创办过程的连续报道：

一是 1902 年 6 月 23 日《纪官报》载："袁慰帅创设之官报，即在保定省城开办。官报之式，亦如本报之分成书页，以便装钉成帙。刻下，印架、字模尚未购到，大约开办之期，必在秋间。"二是 6 月 26 日《官报续纪》载："袁慰帅已委张巽之太守孝谦为官报局总办。闻已定期七月上旬出报。"三是 7 月 28 日《纪官报》载："办理官报局事张巽之太守，于开办

[1]《〈大公报〉二十年来中国大记事（二）》，《大公报》1922 年 6 月 19 日。
[2]《纪保卫医院》，《大公报》1902 年 6 月 18 日。

各事，布置已有眉目，思虑周密，规模宏敞。袁宫保特捐两万金，以备开局首三月之津贴。惟印架、铅字尚未齐集，故出报之期，犹难预定。”四是 8 月 3 日《纪官报》载：“官报局已从上海购办机器、纸张。闻七月前半月，可以运到保定。想该报出版之期必不远。”可见，截至此时，直隶官报局都是以保定为局址，按部就班地筹备。

此后不久，情况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一是《大公报》1902 年 8 月 14 日《官报总办赴津》载：“总办直隶官报局张巽之太守孝谦，随同袁宫保来京，在福来店暂驻一日，即于初八日早车赴津。”

二是《大公报》1902 年 8 月 18 日《本埠·督辕纪事》载，七月十四日（7 月 17 日），袁世凯在天津接见“候补府张孝谦”。8 月 22 日《廉访来津》载：“直隶学校司总办、丁忧在籍臬司胡景桂，学校司参议、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鲁，同于十六晚，由保定到津，住集贤书院官报局内。十七晚，谒见袁宫保，面商学务要公。”[1]

对于“集贤书院官报局”这个表述，该如何理解呢？如果官报局在集贤书院设立天津办事处或者局机关的话，并无不妥，毕竟天津的地位愈加重要，远远超过了省会保定。

《大公报》对胡景桂、丁惟鲁（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二人的职务描述并不准确，1902 年 8 月 8 日，袁世凯上光绪的《省城设学校司片》载：“直隶省会暨各府、厅、州、县遍立学堂，端绪纷繁，必须有总司学务者，乃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臣现于省城设立学校司，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犹前此之奏设军政司经理全省营务也。学校司置督办一员，以董其成。其中区分三处：一专门教育处，一普通教育处，一编译处，各置总办一员，分理其事。查有在籍前湖南按察使胡景桂，正直博通，体用兼备，堪以派充督办。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鲁，才识敏赡，究心时务，堪以派充专门教育处总办。北洋学习翰林院编修王景禧，学有本原，讲求经济，堪以派充普通教育处总办并暂兼编译处总办事宜。”[2] 直隶学校司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特意从保定到天津来，光顾集贤书院，有何意图？他们与袁世凯“面商学务要公”，又有何意味？

首先是利用集贤书院作为全省各学堂教习资格考试的考场。《大公报》1902 年 8 月 23 日载：“探闻直隶全省各学堂招考教习，即在天津开考。定期：本月二十五日，在北洋医学堂内考试英文教习，由丁家立君监试；二十六日，在集贤书院内考试汉文教习，由胡廉访景桂、丁庶常惟鲁监试。”此次招考为省级考试，规模较大。为此，袁世凯曾专门上奏光绪皇帝，指派丁家立主抓此事。1902 年 6 月 21 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筹办直隶学堂情形折》载：“至指授西学需用洋员，查有美人丁家立，曾在天津大学堂充当总教习，实心任事，造就甚多，现已招致来保，仍派充西学总教习。并令该教习选觅在津学堂诸生，分别考验，择其优等，予以文凭，派往各府、厅、直隶州，分设中学堂，充当教习，冀可次第推广，渐开风气，以仰副朝廷兴学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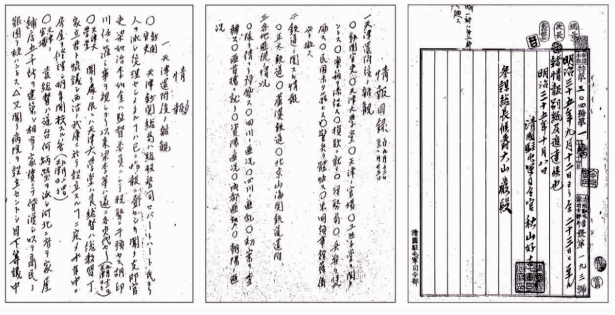
[1]《申报》1902 年 8 月 30 日《云津墨浪》也刊载了这条消息，即：“总办学堂事宜、前山东藩司明方伯，于本月十六日，由京师偕会办丁观察，乘火车至津，小驻河北集贤书院。”文中所称的“明方伯”为误植，应为“胡方伯”，即胡景桂。

[2]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0 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第 406 页。

才之至意。”[1] 光绪朱批为：“着即督饬切实讲求，务期教学相长，以收得人之效。”这表明，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造成的直隶地区教育中断，国家为谋求发展急需各类人才，故广布学堂。但对教习资格却不能马虎，当局重新设立了资格审查门槛，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

其次，应该是重新擘画北洋大学堂新校址。《大公报》1902 年 9 月 11 日《纪官报》载：“直隶官报局总办张巽之太守，于月初由津赴保定，将局中各事拼挡清楚。机器、印架及工匠等，均由水路到津。太守及会计员张君寿岩，乘火车于初六日到津。并闻，保定局所已让归课吏馆公用，津局借集贤书院旧址，房屋尚不敷用，亟须添盖。出版之期又需展缓。”此载表明，官报局入驻集贤书院既成事实。

据以上所载可知，集贤书院已全部由直隶官报局使用。也就是说，袁世凯于 1902 年 6 月做出的“饬将集贤书院赶紧清理，以备重建北洋大学堂之用”的决定，并未得到贯彻落实。同时也表明，北洋大学堂已放弃集贤书院，之后选择了拓展空间更大的西沽武库复校。



侵华日军驻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关注北洋大学堂选址西沽复校的动态（1902 年 10 月 8 日，作为情报向参谋本部电告 9 月 14 日《天津日日新闻》的报道）

笔者判断，集贤书院地处三岔河口北岸的居民聚集区，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此开办大学，差强人意，而北洋官报局则不同。关于北洋官报局的规模，《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原名《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编 1909 年印行）中载北洋官报局的情况：“本局设在河北狮子林。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八月创设，为总督所经营。职员有总办、提调、文案、收支委员、庶务委员、贩卖委员各一名，编辑长一名，记者若干，翻译二名，技术顾问二名（日本人），各种印刷匠八名（日本）。”[2] 1902 年的《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职务》一章载：“本局总办一员，综理局务。举凡局内应办之事以及官报之体例、办事之规则、寄报之章程、报价之数目统由总办核定禀请遵办；本局自总办以次分编纂处、翻译处、绘画处、排印处、文案处、收支处为六股，每股按事务之繁简定人数之多寡，统由总办延订遴派分别委用。”[3] 可见，开办七年之后，北洋官报局组织机构无变化，人数也不多，显然其初创时期的规模，相对集贤书院更为合适。

时至今日，无论集贤书院还是北洋官报局都已踪迹全无。其遗址在今金纬路与狮子林大街交口农业银行一带，曾为天津市第三玻璃厂仓库。

厘清这段历史，若仅见于文章，则难以广为人知，数年后恐又湮没于故纸之中。深望有关部门在集贤书院遗址树立标牌，将这段历史传播出去，则能为增强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又尽一力。

（作者单位：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

[1] 《袁世凯全集（第 10 卷）》第 282 页。
[2] 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第 171 页，1986。
[3] 《大公报》1902 年 9 月 26 日。

韩荫桢与《冬青馆诗存》

侯福志

笔者藏有津沽珍贵文献《冬青馆诗存》，近日应问津书院王振良先生所请对该文献进行校点，不日即可面世。为便于读者了解其人其诗，笔者对诗集作者及内容作了钩沉解读，现整理成文供读者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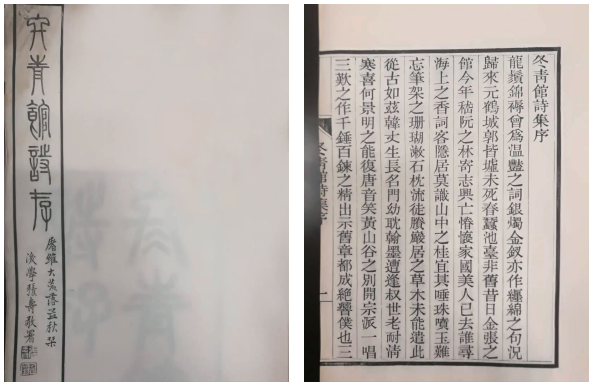
《冬青馆诗存》作者韩荫桢，字芰洲。晚清、民国年间天津诗人。关于作者生年，史料记载缺如。其在丁巳年（1917年）曾作《生日自遣》诗，根据“甲子初周齿又加，红尘容易度年华”两句推断，作者生年应为1857年。另据《挽王桂生姻丈》作者自注：“辛未（1871年）春，孟筱帆夫子馆余家，君来就学，时余年十四，君长余九龄。”亦可得知作者生年为1857年。根据《冬青馆诗存·跋》，韩荫桢于戊辰（1928年）四月离世，享年71岁。

韩荫桢是津沽大家子弟。作者在《奉和齐公震岩题予〈家庭院〉诗即步原韵》一诗注释中载，“予家有楼名数帆，在院之东北角，今废。昔年，先祖镜三公素喜纵酒听歌，暇日延宾，恒集于此”。到了他这一辈，由于战乱影响，加之作者不会持家，基本已经破败，这也是作者慨叹“豪华难再睹”的重要原因。

据《冬青馆诗存·序》介绍，韩荫桢年轻时曾是个“荡子”，中年时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后来，家道中落，方迷途知返。但因适逢家难，“资斧全抛”，全家陷入困境。另据高凌雯作《哭芰舟》（七古诗，详见《刚训斋集》）中的“君才人彀我向隅”“同隶国子班相联”两句诗得知，韩荫桢在15岁时曾参加科举考试，中举后一度在国子监任职（与高凌雯为同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其他朝廷命官一样，他也被迫离职，“天风吹浪掀空起，朝士翩翩返乡里”。返乡后，本可以颐养天年，谁知妻子过早离世，儿子得病夭亡，致使晚年孑然一身，终岁“浇愁仗酒茶”，并以作诗自遣：“却因弃置得宽闲，为拂窗尘寻故纸。群诗哀艳玉谿才，听歌对酒难为怀。”韩荫桢本是诗书传家，世居老城里，名“亦园”，“庚子变乱后割其半为马路”。韩荫桢“素重友”，继承了祖辈的为文好客传统，“自归田后颇喜与朋旧为文酒之会”。“晚年嗜饮效鲸吸，日日呼朋市楼集。长瓶磊落随手携，酒尽悲来掩面泣。”经常在一起的师友有华世奎、高凌雯、王守恂、刘嘉琛等津门耆宿。

1927年冬，已是古稀之年的韩荫桢将其诗作辑成一卷，并托高凌雯在他百年之后删定校刊：“吾病且死，他日删定校雠，子幸为吾尽力。”高凌雯“其时以为戏言耳，笑应之”。转年，韩荫桢病重。其在弥留之际，还多次提及高凌雯，希望能在最后见到老友一面。只可惜天津城内正有战事，“烽火照天人影稀，十日不出扃岩扉。惊闻卧榻已疾甚，虽有扁意无由医。君归未许留片刻，故人一诀竟难得。到门独恨我来迟，车过腹痛应自责”。高凌雯在悲痛之余，不忘老友所托之事，“乃取其（诗）集细勘之，正伪订误，其冗复略有删汰。从前唱和之作，芰洲或未留稿，而余藏诸箧衍者，悉

出以补缀其间，凡存古近体百五十余首（实际是 133 题 169 首）”。由其个人出资刊印，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由高凌雯于 1929 年刊刻的《冬青馆诗存》。



《冬青馆诗存》书影

《冬青馆诗存》由书法家孟定生题签，高凌雯题跋。著名学者、诗人王守恂作序，刘嘉琛（幼樵）、华世奎（璧臣）、高凌雯等津门耆宿，以及原籍伊通的齐耀琳（震岩）、辽阳的陈思（慈首）两位在津居住的学者、诗人分别题诗、题词。

《冬青馆诗存》内容十分丰富，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记录作者与诗友间的唱和、题咏文字。“芰洲素重友，自归田后，颇喜与朋旧哦文酒之会。”经常唱和或题咏的文人学者有王采臣、杨亦香、杨再田、乔亦香、高凌雯、华璧臣等。如《亦香同年为杨君再田以五色笔书册，同人均有题咏》《仲佳以倚声见示赋诗奉答》《和璧臣风诗》《和韵答彤皆江南》《和璧臣闲居诗》等。作者唱和诗中，往往涉及师友们的个人生活和兴趣爱好，可作为研究这些名家的珍贵史料。如《和璧臣闲居诗》有诗云：“帘外天风响佩鱼，侵晨视草入宸居。玉堂一别经三载，谁识先朝旧祕书。”《再和闲居诗》：“宫槐隐约暮云侵，梦断朝班返故岑。病酒已知臣力惫，归田犹戴主恩深。盐梅枉作和羹用，松菊终当入径寻。秃尽鬓毛仍着赋，安仁真个老山林。”这两首诗记述了这位晚清重臣退隐天津后的生活，对于研究华世奎性格、思想和履历很有价值。《送彤皆从事江南》诗云：“寄心清尚本无求，为佐知交事远游。沽上故人三日酒，秣陵战垒六朝秋。陈琳幕下能驰檄，王粲天涯更倚楼。浩浩长江恣眺望，莫援彩笔写离忧。”《和韵答彤皆江南》有诗句云：“桃李开残江上春，寄来缄札墨犹新，哦诗久未酬知己，做郡行将送故人。王粲登楼曾作赋，陶潜耽酒不辞贫。补衣岁晚钦风义，始信交情老更亲。”上述两首诗作，同样可作为研究高凌雯这位著名学者生平的重要史料。唱和诗有一些细节的描述，人物活灵活现。如《八月五夕偕金向丈、邹学老集宗人麟阁寓，听慎先吹笛》有诗句云：“良宵撅笛属吾宗，屡按红腔意未慵。画烛凝烟添寿篆，碧天得月展秋容。酒逢知己斟嫌浅，花到开残色转浓。倾听移时忘坐久，归途已打五更钟。”金向、邹学等二位先生，皆善饮，而且以同醉为乐，亦可作为研究这些文人学士生平、嗜好的重要史料。《送亦香游天台》是一首送别诗，寄予了作者与乔亦香的深厚感情：“天台山上种桃花，刘阮来游尚忆家。抛却尘心觅灵境，知君有意饭胡麻。”

二是记录发生在天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经历了晚清、民国等历史时期，许多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侵华、1917 年华北洪水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直奉战争等，都在作者笔下有所反映。《庚子乱后返故居感赋》描述了八国联军侵略，给天津造成的灾难：“戍鼓敲残隔暝烟，闭门人坐嫩凉天。乍经浩劫欢愉减，苦忆神京涕泪涟。落叶已辞高树去，杂花犹恋折枝鲜。可怜生小怀中女，槁葬斜阳大道边。”在作者笔下，庚子之乱是一场浩劫，不仅毁坏了自

己的家园，还造成了自己的小女儿意外身亡。国仇家恨，尽在诗中。再如《步楚南前辈水灾诗原韵》有诗句云：“秋水盈盈抱郭流，千家瓦屋似渔舟。鸭群争向阶前浴，牛鼻真从槛外浮。却怪栖台常倒影，每逢潮汐便生愁。登高已届重阳节，野涨缘何势未休。”记录的就是1917年天津大水的情景，“秋水盈盈抱郭流，千家瓦屋似渔舟”，形象地反映了水淹城郭、瓦屋似舟的画面。作者还对洪水淹城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天津城既堕，濠墙亦平故水患剧”。《闻警》一诗，记录的是直奉战争的景象：“急烽昨夜照层霄，输送车声气笛骄。月晕边城围渐合，沙沈折戟铁难销。乞兵已误桑维翰，破虏终期霍票姚。北望烟尘倍惆怅，飞行谁更御云轺。”

三是记录作者的日常生活。韩荫桢是性情中人，每有亲故结婚、寿辰、移居或死亡等事件，作者或题诗祝贺，或送挽联哀悼。学者高凌雯曾有纳姬、生女之喜，亦有亡姬之恨。这在作者诗中均有反映。《贺彤皆纳姬，姬为陆伯葵文宗侍婢》记录纳姬事，诗云：“风怀诗好不须删，偶向豪门觅阿环。解舞杨枝乘骆至，有情桃叶荡舟还。东西列屋书曾侍，朝暮添香事本娴。秋月乍亏星更朗，试开虚幌照衰颜。”《贺彤皆如君生女》记录生女事，诗云：“共羡门楣壮，频征玉胜祥。梦中占弄瓦，袖底旧添香。更祝宜孙子，从兹慰老苍。生稊知未已，何事叹枯杨。”《彤皆有亡姬之戚，诗以吊之》记录亡姬事，诗云：“寂寞空帷泪欲垂，可堪潘鬓渐如丝。孤山雪冷梅彫蕊，白社诗成柳折枝。俸少已愁营奠晚，香消终恨育儿迟。拦干倚徧增惆怅，哭诵征君月上词。”据高凌雯《刚训斋集》载，高凌雯姬人叫杨荃，北京人。1927年冬去世。去世时留下一双女儿，其中有一个还不满周月。高凌雯曾作《丁卯冬姬人病亡遗婴甫周月自伤老景殊难为怀》悼念：“好梦真难久，妆楼月不圆。空遗两女累，已了数年缘。独鹤吊残影，寒鸭啼暮天。夜长灯焰短，愁绝不成眠。”

《寿郑丈墨林八十》是一首祝寿诗：“悬孤方届九秋天，黄菊花多簇绮筵。初谒德门犹齿稚，记参钧座尚衣牵。不图童子今华发，始信先生是列仙。此日登堂欣祝嘏，几回骚首忆当年。”王桂生与作者有姻亲，同为孟筱帆（孟广慧之父）门生（同门尚有李桐菴、马芾庭、华韵卿、孙兰洲、叶云青等），王去世后，作者作《挽王桂生姻丈》，诗云：“识面年俱少，师门共服膺。论文怀往日，对酒失良朋。堂寂弦歌歇，窗寒砚水凝。故人零落尽，感喟我何胜。”中国人有温居的习惯，《贺幼樵移居》是一首贺诗，也是一种特殊的“温居”形式：“赁庑去城郭，幽栖隔水涯。牵萝仍补屋，扫径便移花。市远尘难到，庭虚鸟不哗。此闲呈福寓，直欲拟仙家。”《忆旧》反映爱情的美好：“东风吹散绮罗香，欲诉相思已断肠。荡子生年皆惨绿，谗人侈口太雌黄。靓妆未敢矜娇艳，居室真能守纪纲。廿五芳龄思待嫁，只愁身世异齐姜。”

四是反映作者对底层妇女的同情。作者结识不少歌女、妓女，了解这个阶层人的特殊心理，很同情她们的遭遇。如《赠雏妓紫燕》赞美她们外貌，把紫燕比作美丽的莺莺：“肌香肉腻骨轻盈，帐底珍藏掌上擎。我岂诗人张子野，衰年始得识莺莺。”《席上赠校书张丽君》把张丽君比作杨玉环：“良夜张灯泛绿醅，美人倚醉笑颜开。莫嫌酒客常濡首，亲见云鬟没玉杯。”《过某校书寓，值午睡未醒》描写妓女睡姿：“玉钗斜簪枕函松，一榻横陈睡态浓。帘外侍儿呼不起，日斜犹卧绣芙蓉。”在作者笔下，妓女并非总是笑逐颜开，她们同样有困苦，

甚至有死亡。《赠某校书》记述了妓女的人生苦难：“琵琶重抱不胜愁，未语哀情泪已流。知否兰闺旧女伴，可曾相忆到青楼。”更苦的是青楼中人过早离开人世。如《悼校书林氏》云：“北里终宵笑语喧，佳人渊默独无言。愧逢旧戚询家事，懒向时医述病源。山上蘼芜空有泪，村前杨柳更销魂。谁怜梁燕孤栖苦，月落香巢树影昏。”《悼巧云校书兼寄李三少莲、孝定景皇后挽词》有诗句云：“弹罢箜篌意转伤，每谈身世断柔肠。昔年妆阁常依姊，此日穷途那顾娘。翠袖几经挥涕泪，金钱何处寄家乡。病深犹诉相思苦，坐对春灯怨夜长。”

五是描绘津沽的园林史迹。如《亦园杂兴》有诗句云：“绿阴低覆假山旁，门掩残春燕子忙。帘外东风无赖甚，满庭吹落白丁香。”作者自注：“韩家有亦园，内有数帆楼，庚子变乱后割其半为马路。”作者曾在亦园与师友们诗酒唱和。如日本友人羽田大尉、小野少尉，亦假亦园宴饮。《奉和齐公震岩题予〈家庭院〉诗，即步原韵》：“琼筵召莫愁，春入数帆楼。花落笋声歇，宵长烛泪流。豪华难再睹，老病叹迟廖。幸免蜗庐毁，吟身可暂休。”作者自注云：“昔年，先祖镜三公素喜纵酒听歌，暇日延宾，恒集于此。”

《园内芍药将枯，得雨复活，喜而有作》描绘了芍药开放的景象：“清明已过余寒薄，帘外深丛发芍药。准拟今春倦眼开，东风无奈连朝恶。岁旱年荒原野焦，养花无术避炎熇。疏林难蔽骄阳炽，高垄全资古井浇。红披绿抑妖姿减，不枕青苔枕画槛。残香犹带露华浓，低枝半浥池泥黯。堂上主人病初起，排闷频思嗅芳药。恰值西南骤雨来，根株定卜添精髓。莫叹园空生意微，蛰虫销尽土膏肥。何时婪尾重开宴，客至同看金带围。”高凌雯在《听鹃集（1913—1914）》中曾收录一首题为《次韵芰舟亦园杂诗》，诗云：“独立东风惜众芳，黄蜂紫燕送春忙。一花作婢随棠聘，争道无香胜有香。”作者在诗后补注：“亦园海棠、丁香最盛。”

除亦园外，作者还多次提到了金向先生的“百二十畦芍药园”，因园主人丧女，伤情特甚，故作者题诗问候，题目为《乙卯初夏，拟游百二十畦芍药园未果，书赠主人》：“老眼经春涕泪潸，薰风送暖透柴关。将离唱罢愁难遣，独步烟畦自往还。”芍药园不仅有芍药，还有海棠。《过金向丈寓看秋海棠》：“虫声唧唧隔重门，喜见幽花满玉盆。娇艳尚含思妇泪，栽培深戴主人恩。露零文砌苔生晕，秋入闲庭月有痕。明岁亦园勤洒扫，好祈嘉种植篱根。”

六是记述有关名人的一些见闻。韩世昌是著名昆曲艺术家，作者在《观昆伶韩世昌演〈思凡〉》中，绘声绘色描绘了韩世昌的动作表情。其一：“喁喁私语诉春愁，始信山中不可留。夕唪心经朝礼忏，误人容易是孤修。”其二：“旃檀焚尽泪痕潸，萧寺凄清损玉颜。记得当年同命侣，亦曾披鬀入禅关。”

作者与华壁臣是好友，曾在华家看到华壁臣父亲自绘的小像，欣然作《题华屏周表叔自绘小像》一诗：“先生素不娴写真，偶开生面妙入神。意匠经营倍惨淡，吮毫人现画中身。九老沦亡孰与伍，独留清照心弥苦。团扇何尝仿放翁，无须转觉仪容古。时移世易隐墙东，我相虽存障碍空。便欲点睛传阿堵，不须摄影倩良工。敬展斯图览遗笔，描摹自绘真吾出。年年供养对云窗，墨痕常印西斜日。”

《冬青馆诗存》以形象化的文字再现了清末民初数十年间津沽历史的风情画卷，为研究天津地方史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作者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汉沽“桐裕成”张家三代人发家史略述

王雅鸣

桐裕成，汉沽寨上张姓之堂名，因其于寨上庄开设“桐裕成洋广杂货铺”而得名。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张家三代人凭借先进的经营理念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开滩置盐为基础，逐渐向商业、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扩张，成为了汉沽首富，也实现了从小盐滩主向民族工商业领军人物的华丽转身。

张廷惠：诚信为本生意旺

张廷惠为寨上张氏家族第十五世祖，是汉沽第一大滩户“桐裕成”的第一代创业人。张廷惠家族自清嘉庆初年始经营盐业，原有盐滩十副。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廷惠执掌家业。因常与盐商联系卖盐，得以结识大盐商“益照临”张家、“瑞昌店”李家。但张廷惠原来的两副滩总产 5 千余包，不能满足供应。于是又联络亲族 10 余户，以保障供应充足，从而船到盐清，取得张、李两盐商的信任，遂成“发海”人。

张廷惠为人忠厚，诚实守信，深得盐商青睐。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初四，汉沽沿海发生风暴潮，新盐冲化殆尽，盐价飞涨，每百包由白银 8 两涨到 108 两。有的发海人借机退约增价，张廷惠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按原价如数交盐，并说：“即已定约，即应遵守，赔赚乃我分内之事。”

为此，瑞昌店东家“李善人”深受感动，遂对张廷惠说：“以后你有事尽管找我。”并关照他经营的瑞恒银号经理：“汉沽的张廷惠如用钱，借多少给多少。”由于盐商的信任，张廷惠当发海人近 20 年，在为灶户卖盐之中也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成为富甲一方的盐商之一。

光绪末年，发海人改称灶首。灶首名由灶户推举，实为盐商提名。当时，根据汉沽滩区各灶户的要求，需设 2 名灶首。两名灶首的权限和势力范围临时划分，以寨上小石桥为界，桥以北有灶户 36 户，由吴玉堂灶首负责批卖原盐；桥以南有 42 个灶户，由张廷惠灶首负责批卖原盐。而居住在营城、芦台和沿海一带的灶户，可以自愿加入哪一方。灶首的办公经费是主管官署批准的“五厘头”。张廷惠负责寨上庄石桥（水安桥）以南 42 户之灶首，依规从盐价中收取“五厘头”（每百两盐价提白银五钱），为灶首办公费用，每年收几百两。

在汉沽早期的滩契中，存有一张以汉沽灶首张廷惠名义购买盐滩的滩契，白纸黑字，可以一窥当时张家的雄厚实力，时间是民国八年（1919）。“立卖滩契人余庆堂，今有自置中沟第三十六号官滩一副，坐落张家大沟，滩名老虎洞，人工五名。因正用，烦中说允，情愿卖

与张廷惠名下管业。言明卖价大洋贰仟伍佰圆整。其洋同中笔下交足不欠。所有滩中风车一架，滩铺三间，卤坑、冰窖、沟壕池埝、大小石碡、尺地寸土、家具，一切俱在卖价之内。自卖之后，倘有远近族人争竞为碍者，尽在卖主、中人一面承管，不与买主相干。恐口无凭，立此卖契存证。

民国八年正月（1919 年）。”

张廷惠借助盐商李家之力，至 1914 年添置盐滩 7 副。于本庄开设桐裕成洋广杂货铺，后又开同茂盛米面铺、桐益顺木作铺，与人合资于芦台镇经营桐德合粮栈，聚敛了大批财富，张廷惠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由一个小盐滩主向民族工商业者完美转身。

张文洲：垄断经营惹纠纷

张廷惠之子张文洲，聪明好学，耳濡目染，子承父业，展现了极高的经商天赋。他在天津陆续结识曾任烟酒督办的董士恩、津海关监督刘彭寿、盐商“益照临”的经理刘小斋、清候补道邓豁然等商业巨头，为他日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脉和发展空间。1912 年与这四家合组公兴店，又在汉沽开滩 10 副，每年收益颇丰。

1914 年，张文洲正式接替其父充当灶首，执掌家族各项事务。1916 年又与董士恩、刘彭寿等合建三兴公司，低价承租寨上庄李芳树的 5 副滩，年得利 3 万余元。1926 年租期将满，李芳树病故，其子不能守业，张文洲用 1 万元买下其中的 1 副滩“大滩王”。

灶商之间向有矛盾。盐商要垄断销售，灶户要及时售盐。1916 年，张文洲代表灶户向芦纲公所（盐商组织）借款，以驳新盐入坨，但遭拒绝。张一气之下遂与塘沽永利、久大两公司订立售盐合同，所产原盐全部供久大和永利，价格较经销商稍低，晒多少销多少，从此再无销售之虞。但此举激怒盐商，不再买张文洲所代表的 42 户的原盐。此外，张文洲还利用山西、两淮缺盐之机，向该地区借运，每百包价 80 元，但交灶户 60 元，吃价 20 元，长达十几年之久。

张家扩张式敛财方式，引起众滩灶户不满，一时剑拔弩张，舆论四起，有文章列举其多条罪状，甚至闹到报馆。1922 年 8 月 6 日，民国间发行的《益世报》载文，“芦台灶户之呼吁”，控告灶首，欺上瞒下，强取豪夺的行径。

《益世报》所载全文如下：

昨闻芦台场灶户吴学彬等三十六家，具呈省公署文云：为灶首、科长伙谋勾串罔法，吞公害灶殃民事。

窃长芦法向例，商灶直接凡正运借运，皆芦纲公所支配，毫无偏枯。乃芦场科长张宗富与灶首张文洲，视厂长为傀儡，破坏成例，罔法吞公，滩皆朝不虑夕，姑略举数端为钧宪敬陈之。

原民国六年（1917 年），众灶出款一万五千元买地修垣，此款伊二人经手，仅用一万二千余元。下剩理宜宣布，至灶户呈请质问，竟屡次支吾，此罔法吞公者一也。

又六年，众灶借修压滩费八万元，虽照数具领，实行七万五六千元，下余之款，究竟归为何处，亦未宣布，此其罔法吞公者二也。

去岁张灶首与张科长，假四十二户立案，

卖与海光襄八各商大盐二十万包上下，此款应遵司长指令存储场署，到期与四十二户支配，乃至今未见分文，此其罔法吞公者三也。

且物各有主，伊二人盗卖芦纲之盐，私自立案，竟出售二万余包，此其罔法吞公者四也。

商灶相交向无差错，伊等巧立名目，灶户卖与借运盐，每车要注册费二元，外尤加厘头一元，如不承认，即百般刁难。张灶首尤从旁威吓，众灶只得曲从，此其罔法吞公者五也。

又民国十年（1921年），张灶首勾串伊堂弟张文铖与张科长，伙卖作盐绠手数名，得运动费数千元，工人因分利太多，合场罢工。去岁登诸公报，在上峰屡次仲宽，至今犹未落平，此其罔法吞公者六也。

在三年前，张灶首呈请与芦纲断绝关系，乃不卖芦纲之盐又争芦纲之款，今春卖与海光襄八各商大盐二十包，价洋十数万元，亦未与众灶分配，恃科长作主，皆敢怒而不敢言，此其罔法吞公者七也。

灶等与若辈素无嫌隙，因盐破坏生命无存，恳请省长饬长芦司长确实调查，严行究办云云。

在商言商，经商言利。张文洲的所作所为皆为经商范围之内，难下结论。双方各执一词，均有道理，互不相让，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虽说有舆论在侧，但并未影响张文洲家族的聚财之道，张家依旧照常经营发展，影响日隆。在他掌管家务期间，又增置盐滩9副，另合组的公兴店10副滩中还有张家七分之二的股份，并在天津合资开设正阳金店，向永利碱厂、福星面粉厂各入股1万元。

张象言：青出于蓝谱新篇

1930年，张文洲完成权力移交，其侄张象言继掌家务。1932年取消灶首，改建滩业公会，张象言任汉沽滩业公会会长，后改任副会长，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1938年日本华北盐业公司贷款给滩户开滩以盐还贷，成立新滩委员会，张象言任委员长，利用贷款开滩5副。

张象言除经营盐滩之外，还向房地产、商业大量投资，获益颇丰。

张家雇有长工、季节工290余名，每年还使用临时工2万余工日。在为盐工提供广泛就业的同时，也囤积了大量财富，延续了张家殷实、强大的物质基础，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商，跻身津城富商的行列。

至此，张氏家族历经张廷惠、张文洲、张象言祖孙三代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盐滩增至31副，占地9790亩，时占全境盐滩面积的5.8%。此外，在天津市内与人合资开设文兴、正丰银号和祥麟当各1个，正阳金店3号1所；有楼房11所，平房1处，后又于北京与人合资开设正丰金店，成为名副其实的汉沽首富。

张家的发家史，无疑也是汉沽民族工商业者拓荒开滩、艰苦兴业的创业典范，引领和带动了其他民族工商业者竞相拓荒置业。通过他们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让人们看到在汉沽这片盐碱地上，我们的父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艰辛，彰显了百折不挠、开拓创新的可贵品质，值得深思与钦佩！

（供稿单位：滨海新区档案馆）

抗战前的南开话剧

宋伯玥　王　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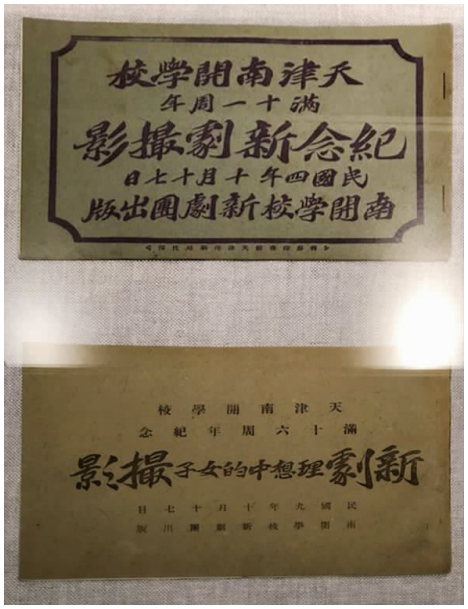
《蒋公的面子》编剧温方伊来津做活动，南开大学翔宇剧社进行了剧本朗读。南开大学百年校庆，话剧演出这一传统也是值得提一提的。抗战前的南开话剧，按时间分，由南开学校创建到南开大学初建前为第一时期，话剧在南开学校逐渐发展壮大到七七事变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迁为第二时期。

1909 年，南开学校成立五周年，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归来，自编、自导、自演新戏《用非所学》，公演于严宅东院，并饰演男主角贾有志。在《南开四十周年纪念校庆特刊》一文中，张伯苓先生特别指出《用非所学》为南开第一次出台公演的话剧。1909 年也是公认的南开话剧的开端。不过据严仁曾先生晚年回忆“其实南开最早的戏是《箴膏起废》，是由张伯苓校长编演的剧本。第一次演出是在我们家的花园里，一个比较高点的地方当舞台，同时还演过《恩怨缘》”。[1] 另据 1989 年 10 月出版的《南开大学校史》一书描述“南开最早演新剧是 1906 年。那时学校还在严宅，剧名为《箴膏起废》，张伯苓和严氏子弟等都参加演出”。[2] 天津博物馆在展的有关严修先生的展览也有相关资料表明，南开的首次话剧演出是在 1906 年。1906 年也是春柳社在日本创建的年份，这一年对于中国话剧意义重大。根据相关史料以及当事人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开最早演出的新剧是《箴膏起废》，但南开话剧的开端由其公演的性质所决定，是在 1909 年。1919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胡适曾撰文指出，“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所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戏的意味。他们那边还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3]

目前公认的南开大学的成立日期是 1919 年 10 月 17 日，也就是说在 1919 年 10 月以前，南开的话剧是以南开学校为核心的，知名的话剧为《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等。其中《一元钱》的编剧为津门乡绅严修（严范孙）；《一念差》由时趾周主持编撰。《新村正》的主稿为张彭春，张同时担任该剧导演，1934 年南开中学三十年校庆时，《新村正》又重新加工，比这一时期更加成熟。这一时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都是男生上台表演话剧，女性形象均为男扮女装，伉乃如与周翔宇经常饰演两口子，其中周为女主角扮演者。大部分剧本的创作是只有提纲，没有台词的，是同学们与老师们在进行话剧活动与彩排时，共同商议与探

[1]《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第 118 页。
[2]《南开大学校史》第 56 页。
[3]《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第 18 页。

讨，逐渐创作与完善台词。该时期创作公演的知名戏剧颇多，有《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仇大娘》等。知名的社团为南开新剧团。该团作为南开的拳头级社团，在抗战前一直存在与发展，在社会上享有盛名。南开创作新戏里的有些剧本，与时代紧密结合，被知名戏班拿走，进行公开演出，鲁迅、周作人、胡适、梅兰芳等知名人士都观摩过。



天津博物馆智启津沽图片展，南开新剧《箴膏起废》与《理想中的女子》资料

1919 年，南开大学成立。彼时的话剧也从初期的练习学生口语表达、影响民众思想、增加民众道德感的宗旨变为向纯艺术话剧的表现形式发展。“允公允能”是南开的校训，话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话剧与本土相融合一直是这一时期南开话剧所追寻的。1921 年，《钦差大臣》改编为《巡按》是这种变化的开始。1925 年春，司徒月兰教授导演英译《情医》。同年 5 月 2、3 日两夜，南开学校大学部一九二五级同学，在中学部大礼堂演出由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公开售票。自《少奶奶的扇子》开始剧词固定，南开剧团始有背词一事。[1]

原南开大学英文老师司徒月兰在 1925 年同学录上资料

由话剧演出资助的 1925 年南开学校同学录

《少奶奶的扇子》所用剧本为洪深改编本，但南开新剧团自己改译过多部国外知名作品，改编后的《刚愎的医生》（1928.3.20，易卜生诞辰百年，原剧本为《国家公敌》）、《娜拉》

[1]《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第 50 页。

（1928.10.17，原剧本为《玩偶之家》）、《争强》（1929.10.17，原剧本为《斗争》，作者系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财狂》（原剧本为《悭吝人》，作者为莫里哀，1935.12.7 与 1935.12.8）等名剧均登上过南开的舞台。括号内的时间为南开新剧团有据可查的剧目公演时间，其中 3 月 20 日为易卜生诞辰日，10 月 17 日南开校庆日。自《争强》开始，南开的话剧舞台已能男女同台。1928 年演出的《娜拉》应为复排，林徽因女士担任舞台道具设计，《娜拉》演出成功后，还曾受天津妇女会的邀请进行募捐义演。不仅《娜拉》为社慈善活动进行过义演，《财狂》亦然，此剧舞美亦为林徽因。《娜拉》的男女主演为张平群与曹禺（万家宝）。俩人在多部戏里有过合作，包括后来更出名的《财狂》。当时，女主角娜拉的扮演者是被称为万家宝的南开学生，而演出《财狂》时万家宝也从南开学生变成南开校友。万家宝与前文提到过的周翔宇，以及后来的黄宗江并列为南开三大女主角。同时，曹禺和张平群与伉乃如、吴京、李国琛并称为南开话剧五虎。其中，李国琛亦为南开篮球五虎之一。在《南开新剧与南开校友》一文中，陆善忱先生是这样描写李国琛的，“民国十七年公演易卜生的《娜拉》，南开五虎篮球将李国琛饰脚行，李君只在第一幕有一两句对话，和把行李放在屋里一个小动作。李君对该剧排演之勤，不在其他演员之下”。[1] 可见李君的敬业精神，把每一件小事干好了极为不易，先生的态度，值得内行与外行共同学习。演出《娜拉》时，张平群是南开的老师，但仍与学生万家宝一同参加演出，可见南开话剧的宽松态度及学生与老师间的其乐融融。“南开的传统是，一进排演场，不分师生，一律平等，可以互相批评帮助。伉乃如当时说，‘万家宝，你是花儿，我们是叶儿！’师生间非常融洽，每逢排戏大家都当作是非常高兴的事，是精神享受。当时排练严格极了，没一个迟到早退的。”[2] 伉也是五虎里的老师之一，其他三虎彼时还为学生。这一时期，除上述几部比较有名的改编剧外，南开新剧团也公演过《理想中的女子》《好事多磨》《虚伪》《群鬼》等。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平津侵略进一步加剧，南开亦未能幸免，中学部与大学部被迫南迁，话剧活动也随之南下。

南开话剧的发展，亦离不开张伯苓先生与其胞弟张彭春的贡献。伯苓先生对于学生全方面发展的思考以及张仲述先生对于艺术的理解，以及对话剧更深层次的思考都对南开话剧有所帮助。张彭春先生戏剧助教巩思文先生在《南开校友》第一卷（1936 年 2 月 15 日）发表文章《〈财狂〉改编本的新贡献》中提及梅耶荷德，也是较早向中国观众介绍梅耶荷德的人。其实张先生随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时见过梅耶荷德，并对梅耶荷德的某些观点是认同的，斯坦尼斯拉夫与梅耶荷德的理念都对张彭春有过影响。1916 年，张彭春归国，担任南开学校新剧团的副团长，将在西方的所见所识所学应用于话剧创作，但初期创作的《醒》，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并不算成功。其理论与实践的完善，是随着多次进修与出访，多次实践慢慢达到一定高度的。先生是一位全才，既

（下转第 50 页）

[1]《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剧论卷》第 324 页。
[2]《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剧论卷》第 334 页。

贺家口引河的前世今生

章用秀

贺家口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北部，泛指今福建路、解放南路和津河下游交汇处一带。清乾隆五年（1740），为引海河水灌溉贺家口、东楼、西楼、小王庄、佟楼一带的农田，人工开挖了一条河，叫贺家口引河，因流经佟楼村，也叫佟家楼河，后又更名废墙子河。这条河渠，西起八里台，向东流入海河，是今津河的主要部分，在天津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引河起之贺家口

何谓“引河”？引河是指为引水灌溉而开挖的河道。关于引河的作用，清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因天津水患与津人沈兆沄议弭患之策。沈兆沄说：“天津仅海河受南北运河之水，夏秋之交，海潮顶阻不纳众流，则奔驰泛滥，天津被害独重。治水之法，在南北运河之上游池水分流，以杀其势。使三岔河口受水较轻，其势自缓，此一定不移之论也。蒋玉虹《志稿》载引河甚多，如马家口、海光寺，均为居民房舍，安有河迹可寻？要之，前迹虽不可寻，多开引河，自是持论不磨。沈兆沄之论治河，未尝不本于此。蒋玉虹《志稿》有云：白塘口至波水洼，有引河一道，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因其迹开卫津河，自八里台以达津南洼，挖正河计五十余里，并于白塘口、双港、北八里口、聚宝庄通支河八道，统计正河、支河一百三十余里，桥十一座。是年，东南乡水势泛滥，故开支河以达于海也。”[1]

清道光丙午（1846 年）刊《津门保甲图说》有《引河图说》，其中说道：“自天津东门外起至大沽止，共八道，内惟咸水沽、杨惠庄、盐房桥三道尚通畅，舟楫可行；其何家圈、太平庄等地，虽间有淤塞，然此时欲流瀹深通，不惟需费过繁，而形势弯环，亦难资宣泄，可无议修。”且特别提到以下三条：贺家口引河，工长约二千余丈，系消波水洼积水入海，其石闸一座，外护潮水，内消沥水，伺长落以为启闭，於民田实有关系，急议修筑挑浚；双港引河，工长约三千余丈，亦消波水洼积水者，形势与贺家口同；白塘口引河，工长约四千余丈，系消黄花泊积水入海，河身俱已淤塞，亟宜挑浚，其桥闸藉资启闭，坍塌处尤宜兴修。

由于时代变迁，天津旧时开挖的引河有的现已不再发挥作用，有的依然保留，如天津市中部的月牙河，清雍正三年（1725）开挖，引海河水屯垦，俗称“老河”。1959 年疏浚拓宽，因其形如月牙而改称今名。北起今东丽区跃进路与北环铁路相交之西减河，南至东丽区吴嘴村南入海河，长 14.4 千米。此外，还有北辰区的永金引河、郎园引河，东丽区的新地河，津南区的洪泥河、幸福河、十米河，宁河区的西

[1]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二。

关引河，武清区的东狼窝引河，静海区的港团引河等。

贺家口引河的取名与其地理位置有关。贺家口引河东起海河岸边之贺家口，西至卫津河处之八里台。贺家口西有海河叠道，为通往咸水沽、葛沽、大沽之要道。《津门保甲图》“东南一带村庄”，第十四图标有贺家口引河，在此河往东入海河处，即贺家口引河与海河夹角偏南的地方有一个村庄便是贺家口。贺家口是天津海河最早的官办渡口之一。《天津县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天津设官渡八处，地点在北马头、晏公庙、大直沽、宝船口、西沽、杨柳青、真武庙、寇家口。寇家口就是贺家口。因早年这里建有河闸，习称河闸口，后讹传为贺家口。《乾隆天津县志》记有“南路，自倪家台至芦北口一百村庄”，其中就有贺家口。贺家口东南有贺家口闸桥。据《县志》所记，清代天津城关和四郊新建与重修的桥梁共有五十三座，其中即有“贺家口闸桥”。《津门保甲图说》记曰：“河流至大直沽为一大曲，道随之而转，其支流穿道过石桥束之，贺家口村在桥左，大孙庄有挂甲寺——津邑刹宇之最古者。相传唐时征辽师旋驻此，明张良相讨日本取道其间，亦矢旋时挂甲，实要地也，今寺仅存。雍正六年，营田观察使黄世发於此营围田。对岸曰小田庄，河东曰大孙庄、小孙庄，其西半蓝田也。图内庙三，南界土城村。铺户一十九户，烟户二百三十三户，佣作二十五户，负贩一十四户，僧道二户。共二百九十三户（大口九百一十七口；小口四百六十七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犯海河，曾在贺家口与清军交战。1858 年 5 月 20 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进逼天津。从大沽败退到南郊的兵部侍郎国瑞率领 500 马队，驻扎在天津黑牛城。5 月 25 日，英法联军溯海河进至贺家口，遥望黑牛城有清军马队营盘，鸣炮以震之，清军马队又移营王阑堤（今王顶堤）。时有对联佐证：“贺家口鸣炮惊马队，王阑堤演武立军营。”英法联军军舰遂沿海河上驶，兵临天津城下，清政府屈辱求和，6 月，英、法、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贺家口在民国时期仍是天津西南部的重镇。笔者收藏一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 年）再版的《中国新舆图》，内有直隶省全图，在天津的东南方即标有“贺家口”，再往东南也只有双港、咸水沽、兴农镇（今小站）了。现今贺家口村已不存在。

贺家口引河亦称废墙子河，是因为有人将这条河与当年的墙子河挂在一起。当年的墙子河在贺家口引河北面，其东面一大段与贺家口引河大体平行，20 世纪 70 年代修地铁时将其填平，成为今天的南京路。墙子河的开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历史大大晚于贺家口引河。1860 年，清政府为加强海口的防御，曾派僧格林沁坐镇津门。僧王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称：“天津紧要重地，因设法严防，附城一带挑挖重濠，筑立土城，将城门关厢圈入重濠，守濠即守城。”咸丰皇帝密诏僧王：“挑挖环濠，布置事宜，亦属周密。”这里说的“土城”，即民间所说的“墙子”；“濠”即“墙子河”。开挖濠河（墙子河），以其泥土筑土城，然后设门。沿濠的土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筑成。全长 18 千米，深沟高垒，距天津老城三五里不等，营门共设 11 个（现大营门、小营门等地名仍存）。为防止英法联军再次进犯天津，在墙子设防炮位数十座，同时在城东南海河两岸建炮台 2 座，安置铜炮 20 余座。但未能抵御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天津，城东南失守。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天津城墙被迫拆除，濠墙当然也陆续被拆除，只剩下一条墙子河了。

由于沿途天津各租界不断向河内排入污水，墙子河水质逐渐变差。据称，1925 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曾提出引南运河水对墙子河进行冲洗的方案。1936 年，当时的天津农会也提出同样设想，但均未实行。20 世纪 70 年代，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墙子河沿线修建地铁，墙子河位于今南京路的海光寺至大营门段被填平，剩余的部分陆续改建为暗渠，当时保留在地面的只有三元村至红旗河段，称为“西墙子河”。此后，墙子河在海光寺以西的长江道部分也陆续被填平。目前，墙子河只留下红桥区小西关到南开区长江道一段，成为津河一部分。

可见墙子河与旧时的贺家口引河既无关联，又无新旧之分。所谓旧墙子河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也有人认为贺家口引河改名废墙子河，可能与 1900 年以后外国租界的扩展、濠墙的拆除、墙子河与废墙子河作用相像等有关，时间大概在 1900 年以后。1957 年，天津文史专家陈铁卿在《津沽杂考》里说：“废墙子河在本市南部，西起卫津河的吴家窑工人新村，东流入海河，河身和墙子下游一般约略平行。在早年天津城南本来多水，再往南积水更多，一遇连雨，‘卫南洼’一带即汪洋一片。清光绪十六年（1890），为宣泄城南的水，特向南开河一道，计长五十余里，就是卫津河，并由卫津河向东开了几道引河，以利排除积水。所谓‘废墙子河’是最北的一道引河。这河道原来没有一定的名称，因为流经佟楼村，在旧日地图上即称为‘佟家楼河’。这‘废墙子河’一名是后来才有的，很不恰当。现在这河清洁绿化，供人游览，应该更换一个较适宜的名称。”[1] 陈先生的这段文字将人们何以将贺家口引河误称“废墙子河”说得很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文献上看，该河的开挖时间比陈先生说的要早。

[1] 《天津文史丛刊》第二期。

谁人挖浚灌良田

贺家口引河最早的形成得从天津的屯田说起。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在今津南地区垦荒种稻的记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巡察海河下游地区，看到葛沽、白塘口一带，地广人稀，荒草弥漫，几乎没有田地庄稼。奏准朝廷，提出“滨海屯田，试种有效，留军并垦，招民兼种”的一整套屯垦主张，沿着海河南岸，由西至东，先后开垦了“十围”，就是十大块围田：即贺家口、何家圈、吴家嘴、双港、白塘口、咸水沽、西泥沽、东泥沽、盘沽、葛沽（具体记载不一致）十大垦区，共开垦土地 450 余顷，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十字围”。所谓“十字围”，就是汪应蛟对新开垦的水稻围田的十个字的编号，其实是两句五言谚语：“求人诚足愚，食力古所贵。”其做法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清人华长卿有《十字围》诗对汪应蛟等垦荒治碱，兴修水利，将百里斥卤荒滩改造成万顷良田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诗云：“士人千载利其利，举杯一酹汪司农。”清李云楣（采仙）有《津门新乐府》之《十字围（修水利也）》云：“无游民，无旷土，岁取菽粟不可数。”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蓝理调任天津镇总兵，到任之后，他见“畿辅产米无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开河引水灌稻田”，于是上疏奏请皇帝批准进行营田。蓝理营田一方面采用与明朝类似的军屯方式，以“节省兵饷”，另一方面则计划招募福建农民二百余人开垦水田。蓝理计划以此为开端，一旦试验成功，就打算进一步招募江南农民，以便在天津“将沿

海弃地尽行开垦”。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成二百顷，“岁收丰稔”获得成功。据称，起初蓝理的母亲担心挖沟渠会不会浸泡了别人的冢墓，蓝理又实地考查亲阅郊原，确认对冢墓无患，他母亲才放了心。后人为了纪念蓝理之功，称之为“蓝田”。乾隆《畿辅通志》卷四十七载：“贺家口围，其西半即蓝田也。东濒海河，因桥建闸，周围筑埝，围内开渠，纵横贯注，共营田三十八顷九十二亩。官民自营田九顷。”

蓝理这次营田，根据灌溉需要，浚挖了自天津城南八里台经童家楼（今佟楼）至海河边贺家口引河（今津河的一部分）；又开挖了华家圈引河，把城南护城河与贺家口引河连接起来。贺家口引河可利用海河潮水灌溉，如潮水上溯不足，又可经华家圈引河从护城河引一部分水使用。并以这两条河为干渠发展渠系，形成“河渠圩岸数十里”的水网。同时采取了水车提水方法，“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每亩产量达四五石。这次营田，使天津城南的沼泽洼地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乾隆《天津县志》记述当时这片洼地“雨后新凉，水田漠漠，人号为小江南”。

实际上，当初蓝理所开挖的河道，已具有贺家口引河的雏形，但并不完整，也并未命名。笔者查阅《乾隆天津县志》，见《天津县境舆图》已标明贺家口南面的土城及八里台等，但尚未标出“贺家口引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蓝理升任福建提督离开天津。康熙四十九年，直隶巡抚赵宏燮上了个奏折，提出将蓝理开辟的一百五十顷水田交天津参将蓝珠管理，经户部议后准奏。而自蓝珠之后就无人管理，以致“圩坍河淤，数载废为荒壤”。雍正乾隆年间，又倡导营田，浚旧渠，引潮水灌溉，重开凿“贺家口引河”。据清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记载：“贺家口至佟楼共长八百二十三丈，又接挖八里台，长五百十三丈。乾隆五年海河垫道案内开挖，又于十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三次水利案内挑挖。”清道光二十六年（1826）《津门保甲图说》记载：“贺家口引河工，长约二千余丈，系消波水洼，积水入海，其石闸一座，外护潮水，内消沥水，伺长落以为启闭，与民田实有关系，急议修筑挑浚。”

清人王履泰编有一部规模宏大的《畿辅安澜志》（成书于嘉庆十三年，即 1808 年），在此书的“卫河”部分，载有《乾隆十二年三次水利工程奏署》，有如下内容：“乾隆八年，天津道陶正屯请自天津护城河起，由八里台东至佟家楼，开渠一道，接连贺家口旧有引河，借城东南隅之海河闸，以通潮汐。附近居民田亩，水旱皆得播种。”此奏通过时任直隶总督并兼管北河河道总督职务的高斌上报朝廷。乾隆九年，高斌又有《查勘水利工程疏》，除汇报上年河道开挖情况，云“附近居民田亩，水旱俱得播种。计用过银一千二百八十七两零”，为完善城南水利系统，又进一步提出：“今复逐加履勘，县南地形辽阔，新河河渠尚未能尽地利。应于八里台新开渠南，由凌家口西南至陈家庄，再开一渠，通至坡水洼。又自凌家口东南，由梨园头东至大任家庄，复西南至药王庙开渠一道，入白塘口旧引河，亦通至坡水洼。”这里所称坡水洼大概即前文所言之波水挖。

《续天津县志》卷七《河渠》除记载贺家口引河外，还记八里台至波水洼引河曰：“八里台至波水洼引河共长三千六百二十丈，除八里台至凌家口长一千九百六十丈，向系民修，其凌家口至波水洼引河，长一千六百六十丈，与乾隆十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三次水利案内挑挖。”可知贺家口引河在八里台与八里台至波水洼引河相沟通，且两河挑挖和疏浚的时间大体相同。关文斌在《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文明初曙》一书中说：“1740 年，在白塘口和咸

水沽又开挖了两条河流，接着又挖了一条连接天津城濠通往八里台（南开大学所在地）、最后在贺家口入海河的水道。1745 年又在白塘口和贺家口之间开挖了 100 多里长的河流网络，从而增强了这些河道的泄洪能力，因此天津南部的洪水得以分流而后注入海河。”

从清光绪十年（1884）的《天津县图（上）》看，从“关闸”至“八里台”的贺家口引河已清晰地标明呈现出来。并且还看到，与此河交汇的是：八里台以北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此河直通天津城之西南；八里台向西南方向的一条河即注入波水洼（也有称坡水者）。再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天津地图》看，贺家口引河东起海河，西头在八里台北与卫津河垂直相通，往南与今日河渠亦同，往西通向复兴河。

为何止于湘江道

贺家口引河东入海河，本是与海河相通的，今天我们看到津河在解放南路与湘江道交口的地方却“到头”了，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海河河道并不是现今这样直畅，而是曲折回旋，有多个大弯道，20 世纪初海河进行了裁弯取直，致使海河在这里“短”了一块，再后来又填平了一段旧河道，于是津河便与海河“分离”了。

关于海河“裁弯取直”，最早也经过一番周折。1887 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海关报告中建议海河裁弯取直，由于费用较大遭到清朝官方的抵制而搁浅。1890 年，德璀琳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由英国人带头负责疏浚河道，还是遭到地方官员和民众的抵制。直到 1897 年，甲午战争之后，直隶总督换成了王文韶，鉴于海河水旱灾害给航运业及海河沿岸居民造成的严重损失，与多国领事负责人达成协议，成立了海河工程局，组成海河工程委员会，海河裁弯工程逐渐展开。

最早的一次裁弯取直工程是 1902 年完成的挂甲寺、杨庄子一段。1918 年，三岔河口进行裁弯取直工程，裁直了北运河一个大弯，新开了一段新河。将望海楼南的老三岔河口移到了金钢桥以西、大王庙以北。缩短航道长度 1585 米。同时还裁直了南运河侯家后至老铁桥一段大弯。1921 年裁直南运河梁家嘴一段，取消邵公庄至赵家场的西大湾子。至 1924 年，一共完成了六段裁弯取直工程。海河河道缩短了 26.6 千米，河床普遍刷深、拓宽，增加了河道的纳潮量。

当年贺家口引河的东头，海河是一个弓形的大弯，《津门保甲图说》记载：河流至大直沽为一大曲，海河流过大直沽后形成了一个大弯道，在其西岸引出一条岔河，俗称贺家口引河。从《津门保甲图》上看贺家口引河入海河处正在海河拱起的“弓背”上，1901 年裁弯取直恰恰将这“弓背”裁去了，根据海河裁弯取直前国外出版的一份天津地图可以看出，这个弯道还是比较大的，其流经的位置大概在湘江道与解放南路交口一带，转弯处在解放南路西侧。由于裁弯取直，原本属于河东的杨庄子、挂甲寺，却到了河西。

海河直了，贺家口引河本该“断了头”，与海河“分离”了。但裁弯后的这段海河旧河道并未完全消失，从 1924 年绘制的《天津及城厢形势图》来看，此处的海河弯道虽已取直，然旧河道还标有虚线，可知这段海河故道是后来才逐渐填平并修成马路的。老河西人熟悉的古海道，过去实际上曾是一条“龙须沟”，也被称为老海河，1985 年被填平成路，因为这里曾是“海河故道”，所以定名为沽海道，后来又被称为古海道。今之湘江道是北面的旧河道，利用这段旧河道将贺家口引河贯通到海河，等于将其向东延长了一段。再到后来修建了方涵，方涵即为涵洞，指水渠通过道路的地

方，为了不妨碍交通，修筑于路面下的过路孔洞。贺家口引河的水流至湘江道方涵进入北洋闸泵站泵入海河，这一段旧河道也被填平了，于是现今的津河便“止于”解放南路与湘江道的交汇处。

李鸿友先生在《河西区段津河忆旧》一文中讲到了这一段河道的变迁。他说：“我出生在贺家口引河北岸小滑庄的润善里。从贺家口桥（今福建路桥）开始，河南岸为前庄，河北岸为后庄。老海河旧道就由现光华桥顺湘江道穿解放南路，在贺家口拐向南流，经挂甲寺至杨庄子，再拐回向东，由现在的土城新城小区直扎到海河杨庄子渡口，呈 U 字型。1901 年海河裁弯取直前，挂甲寺、杨庄子皆在海河东岸，直到解放初期旧河道依然存在，只不过成小河沟子了。后来修了解放南路，原来的海河故道就踪影皆无了。”

从 1985 年绘制的《天津市河西区地名图》上看，这段旧河道已经不复存在，成为今天的湘江道。

百年变迁换新颜

贺家口引河自乾隆五年（1740）以后四次挑挖，由东而西直至八里台。这条引河的作用在于引海河之水灌溉贺家口、佟楼一带农田，且有石闸控制，防止海河涨潮倒灌，并承担泄沥涝积水的功能，是一条有利于民生的河道。民国时期，这条河部分担负着航运和排灌的作用，且与卫津河、复康河、南围堤河相通，沿岸码头常常供一些运砖的木船停靠。民国六年（1917）天津特大水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发现墙子河堤有一定防洪作用，而老西开、英租界的五大道、德租界等地均在墙子河外，为此在灾后重建时，他决定将墙子河堤南移到贺家口引河一带，自八里台到挂甲寺建成新的防洪围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佟楼乘布棚船，可以驶往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带观荷花，或到青龙潭（今水上公园）消夏避暑。到了 40 年代这条河已经失去灌溉和行船的功能，成了一条污水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不断发展，两岸形成了吴家窑、西南楼工人新村、卫星里居民楼及谦德庄、东楼、玉川居一带居民区。这一地区的雨水污水都经这条河排泄，其功能只限于为汛期蓄排两岸雨水至海河。近几十年来，河道污染逐渐加剧，导致河流滞留变腐。天津市曾于 1962 年、1979 年、1984 年、1988 年多次组织清淤和进行较大规模的疏浚治理。

2000 年政府实施“墙子河改造工程”，当年 3 月 10 日正式开工，9 月 10 日告竣，历时半年。整个工程包括：改造废墙子河、复康河、红旗河、西墙子河、南运河五条废旧河道，总长 18.5 千米，改造后统一更名“津河”。其中废墙子河横贯河西区北半部，西起卫津河八里台桥与卫津河相连，东至解放南路湘江道方涵。全长 4.8 千米，宽 12 米，穿越刘庄、挂甲寺、下瓦房、东楼、谦德庄、西南楼、桃园村、越秀路、马场街九个街道办事处辖区。这次空前的综合整治，使废墙子河变废为宝，两岸绿化风景优美，是天津一条新的风景线，统一命名后，当年的废墙子河即贺家口引河便成为津河的一部分。这项工程利国利民，大大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深得民心。

今天，在解放南路和湘江道的交口处建有一座小公园，叫津河广场，这里是津门胜景——津河风景线的起点，立有《墙子河改造工程碑记》，其中云：“昔日污水臭河，如今碧波荡漾，两岸绿草如茵，美景如画，成为津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供稿单位：河北区方志办）

天津革命史之五村农民反霸斗争

王文振

天津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曾是天津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活动地区。而五村农民反霸斗争正是天津革命史上的一个缩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时间持久、规模宏大的农民斗争。河西区档案馆作为“留凭、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机构，收藏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重溯历史，共同翻开这段尘封的记忆。

“善人”不善

当年天津南乡有五个毗邻的小村庄：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小刘庄。这五个村反对大地主、大盐商“李善人”夺取佃权的斗争，起于1915年直到天津解放。这就是天津有名的五村反霸护佃斗争。

李家原籍江苏昆山，大约在清初康熙年间，北迁到天津落户。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的人物是李春城，也就是所谓“李善人”的第一代。这一家族先是经办盐务，暴敛发家，继之掘取土地，出租盘剥。李家在政治上因积极帮助清王朝抗拒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发迹，当义和团运动兴起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又拼命为中外反动派效劳，后来又积极投靠北洋军阀，和袁世凯、曹锟等结为亲家。所谓“善人”的称号，是李家利用各种手段自我宣扬出来的。

根据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制度，五村的佃户拥有永佃权，每年交固定的佃租。由于天津城市发展迅速，地价不断上涨，李家已不满足于租佃的剥削形式，企图取消永佃权，以便随时可以收回土地，改营房地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后来竟采取加租、垫地、毁青苗等恶毒手段强迫佃农退佃。

1926年，李氏家族分家析产后，五村土地归“李善人”的第三代李荩臣所有。他为了实现夺佃的夙愿，玩弄种种欺骗手法，扣留佃农保存的“永佃租折”，使农民失去凭证。李荩臣还雇用一批流氓打手毁青苗、垫地，致使五十多户佃农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组织领导

正当他们岌岌可危之时，彭真来到他们中间。1926年，年仅24岁的彭真（时名傅茂公）来到天津，担任一部委书记。当时，靠近小刘庄有裕元纱厂，这个厂就是现在棉纱二厂的前身；紧邻挂甲寺村，还有北洋纱厂，现在叫棉纺六厂。这两个工厂都已秘密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彭真直接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他听说五村的反霸斗争迫在眉睫，就想深入到五村了解情况。

河西柴禾厂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时，经常有西楼村青年在那里耍枪弄棒，练习武功。彭真在这里了解到“李善人”剥削农户的过程。

在这里，彭真向农户聊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化情况，从北洋军阀聊到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斗地主的好处；从穷哥们日子不好过，聊到“李善人”不善。大家都爱听他聊天，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农户来到柴禾厂。

在彭真的长期熏陶下，以青年农民为首的五村佃户们终于觉醒了，五村佃户迅速组织起来，反抗“李善人”增租夺地。

1927 年初，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西楼村首先成立了农民互助会，接着，毗邻的东楼村、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也都组织起来。

1927 年 4 月，彭真派裕元纱厂地下党员左振玉来到西楼村，发展甄元合为五村农民中第一个共产党员。随后，又先后介绍曹同兴、张连荣、刘树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五村农民党支部，甄元合任书记。8 月，又派第一部委书记司福祥到五村参加党员活动，领导五村的斗争。

柴禾厂关闭后，彭真同大家联系的地点转移到“荣园”（当时是“李善人”家的大花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南门外菜子地，即甄元合住的窝棚里。

1928 年，在五村成立农民互助会的基础上，联合成立“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俗称“五村反霸斗争联合会”），会址设在东楼玉川居胡同，选出代表为西楼甄元合、杨风池，东楼村刘景同，贺家口华永泰，小滑庄崔宝庆，小刘庄于宝林。甄元合为五村农民总代表。

护佃斗争

为了开展反霸斗争，甄元合、施文兰、杨风池、刘文秀等人在西楼前街 22 号成立了农民习武的国术馆。每当夜色降临，五村农民就到这里习武，商讨抗霸对策。彭真和左振玉经常在这里召集农民开会，研究五村的反霸斗争。他们一方面设法救济失去土地的农民度过春荒，一方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28 年底，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千余名群众，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工人和学生，手持各种小旗一起出动，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增加地租”“反对倾村灭佃”。经过中街，到河北省法院控诉“李善人”不善。同时，组织了几十个农民到李蒓臣家里说理，要求停止毁田垫地，明确提出如果不答应条件，将集体拒付地租。李蒓臣见农民人多势众，唯恐犯了众怒，只好答应“已经垫完的就算了，没垫的地今后不再垫了”。这次斗争取了初步胜利。

李蒓臣的承诺只是缓兵之计。1929 年秋，又开始了他的垫地计划，他把垫地工程包给承包商，承包商雇佣民工从西楼到西南楼铺设小铁道，用轱辘车把土从西南楼推到西楼垫菜园子。五村党支部闻讯后，联络国术馆一帮小伙子，带领大批农民制止承包商毁田垫地，并动手把铺设的小铁道拆掉，把轱辘车推翻，吓得承包商停止了垫地工程。

李蒓臣这次垫地计划未能得逞。他手下的谋士们又向他献上一计，武的不行咱来文的，请律师打官司，不告五村农民代表，专告胆小怕事的佃户，一户一户地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李蒓臣点头称好，于是向法院起诉，并花大钱委托名律师王守臣代办。

李蒓臣伪造契约，向高等法院起诉，迫使农民交地腾房。法庭开庭审理此案。五村党支部派人以五村护佃权委员会的名义，动员一些

农户去法院旁听，并指定几个能言善辩的农民代表相机发言，揭露李莅臣的阴谋。

开庭后，法庭质问被告为何抗拒所有权者行使主权，被传讯的老农提心吊胆，不知如何为自己辩护。早有准备的农民代表站起来侃侃而谈，为佃户辩护。法官严厉提出："你不是被告。不准发言。"农民代表反问："原告是谁?"这时，李莅臣请的律师王守臣傲慢地站起来亮相说："本律师代表原告李莅臣先生。"农民代表质问法官："既然原告花钱请律师代表他讲话，被告没钱请律师，我们五村护佃委员会就要代表被告讲话，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炮打得法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会场秩序大乱。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李莅臣不甘心失败，他一方面再次向高等法院起诉，妄求佃农交地腾房；一方面花钱买通"官面"上的军警，由李家的收租人魏世珍带领，查封农民代表的家。

五村党支部闻讯后，决定针锋相对，把这场斗争引向社会，争取广泛同情，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行径。他们联络附近工厂给予支持，请进步教师写了一份《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以大量事实列举了农民在地主阶级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撕破了"李善人"伪善的真面目，呼吁社会各界都关注事态发展。

这时，彭真同志已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天津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五村农民在彭真培育的五村党支部具体领导下，斗志更加旺盛。1931 年，他们组织广大农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六千余人直奔河北高等法院，要求法院院长接见农民代表，提出对地主强占农民土地做出公正判决。

五村农民哀告书

1935 年，李莅臣打官司未能如愿，又暗中勾结恶霸李珍，让他跟五村农民捣乱，制造混乱，暗杀农民代表。农民不甘示弱，纷纷摩拳擦掌，要跟这帮混混见个高低。同年，彭真获释出狱，负责北方局天津工作组工作。他十分关心五村农民的反霸斗争。当他得知五村农民要与流氓头子拼命时，指示五村党支部：这是"李善人"坐收渔人之利的阴谋，我们不能上当。党员同志耐心做农民工作，又通过关系做李珍工作，让他保持中立。结果这场群殴才未发生，使李莅臣的阴谋又一次落空。

五村反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怀翁亭

五村农民反霸斗争自 1915 年起至 1949 年天津进行土地改革取得最后胜利，离不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揭开了天津农民运动的历史，为党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供稿单位：河西区档案馆）

早年天津卫“银子窝子”——竹竿巷

温　鹏

在天津市红桥区的地名中，有一条既不算长又不够宽，然而名气十足的小道，那就是北大关的竹竿巷。

竹竿巷的由来

北门外直对估衣街的一条小道，是十分清幽窄小的街巷，全长约 300 米，两端宽仅 3 米，中间最宽处也不过 4 米，它既不是大街，也不是小胡同，按照旧制三百六十步为里，它属于里中之道，故称竹竿巷，以示其细长狭窄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早年这条小道中，有一家隆顺号，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卞家开的买卖，经营南货，因专门运销大宗竹竿生意而发迹，故人们称为竹竿巷。竹竿巷东临北门外、北大关，东口与估衣街西口相对，直通锅店街、归贾胡同、侯家后、单街子一带商业繁华区；北靠南运河南岸；南邻针市街、北马路、北门西一带；西口与茶店口、曲店街、缸店街相通，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竹竿巷路面铺着大块的长条板石。据说这是当年在北门东开面粉厂的一位叫梁筱丕的广东富商修的，这个富商为办面粉厂磨面，在北城墙根矗起一个五丈高的大烟囱，并在城墙脚下掏洞挖了一条沟，将南运河的水引来使用。这事被初到天津任知府的汪正道巡视时看到，汪初进官道任知府，正在气盛之时，见此大怒，问谁让这么搞的？左右禀告了梁筱丕的姓名后，附耳说，这人后台可是李中堂大人。谁知汪正道来天津前在太医院当过几年御医，曾给慈禧看过病，不说李中堂罢了，一说李中堂火冒三丈：他有后台李鸿章，我还有后台老佛爷！当下就把姓梁的富商提来，没审问前先一通训，斥他破坏天津风水，告诉他单就破坏城墙一事，就可以马上送斩。梁筱丕吓坏了，汪知府问他愿打还是愿罚。梁筱丕问打是怎么罚又是怎么？汪正道说打是先 40 大板，然后带上 25 斤重的大枷，让你在北门示众一个月；罚是从北门至南运河边给我修一条青石板道，包括竹竿巷和藤萝架胡同。富商梁筱丕当然是认罚了，因为带枷示众比死还难受。那时北门外都是土道，旧谣称“刮风像香炉，下雨变墨盒”，这位汪知府来后总算给天津办了一件好事。

富商梁筱丕果真按知府所说筹资铺上条石，只是北门外一段因为 1939 年拓宽路面时拆除。竹竿巷内却一直保持了多年，直到该地区拆迁时，路面之下，掘尺许，仍可见到梁筱丕铺的条石。

这个小巷里开设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天津商业巨户。商号的建筑大多是宽阔的大四合院，青砖木结构，磨砖对缝青石作碱，大漆门窗隔扇，装修阔绰讲究，古色古香，金字牌匾辉煌夺目。这些大商号，大部分都是天津著名的“八大家”穆家、石家和“棉布业八大家”的金桂山、潘耀庭、卞润吾、胡树屏、孙烺轩、范竹斋、乔泽颂、纪卫瞻等，以及豪绅巨商章瑞廷、大总统冯国璋、大买办魏信臣、巨商孙越桥、赵仲山、赵聘卿等人所营的大棉纱庄、大

银号、大杂货商、大茶叶庄、南货店、麻袋庄和关东烟铺等，可谓天津商业之荟萃。这条小巷里有大棉纱庄二十四家、大银号八家、大杂货贸易商三家、名茶庄两家、大麻袋庄一家、最大最老的烟铺一家，共三十九家商号。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是新老“八大家”所经营的。这些豪富商家全是自有资金，从不靠外力经营，因此素有“银子窝子”之称。

早年竹竿巷内的商家

一、棉纱庄二十四家

隆顺号仁记棉纱庄：该号位于竹竿巷中间，著名茶庄正兴德对过，创办于清嘉庆年间，由天津新“八大家”之一“乡祠卞家”卞荣卿、卞述卿昆仲独资经营，经理张华荪。卞氏昆仲逝世后由卞荣卿之子卞润吾和卞述卿之子卞机吾继承父业，经理张华荪去世后由冯万清继任。该号在上海、日本大阪均有驻庄，资力雄厚，除资本十万两白银外，尚有股东存款及经理、股份掌柜、职工等大量存款一百多万两，每年东伙分红款项，皆存在该号长期不动，连年积累极丰，虽与各大银行、银号有银钱往来，但在一般情况下，从不向银行银号透支或贷款。该号在日本声誉很高，驻大阪负责人与日本各大纺织株式会社关系密切，可直接签购或包销大批棉纱棉布，并包销天津纱厂产品，与华北、东北、西北各大省市区县乡镇各地客帮交往广泛，具有很高信誉，为天津纱布业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该号有谦丰银号、福康仁银号为后盾，在商业竞争中，因资金充裕、实力雄厚，占有绝对优势。

瑞兴益成记棉纱庄：该号位于竹竿巷中间，坐南向北，为天津最大棉纱庄之一，创于 1906 年。股东为峰泽堂金桂山、耀远堂潘耀庭合资经营（金、潘两家皆为“棉布业八大家”），金、潘二人为经理，潘为长期驻日本大阪驻庄负责人，纱布业在日本设庄者首推该号。后来提升范竹斋、倪鉴塘为经理，倪谷香、刘竹久、吉士珍为副理，范竹斋与吉士珍长期驻申庄。潘耀庭逝世后，由倪谷香继任驻日本大阪负责人。资本十万两白银，金、潘各半。因金、潘两家财势大，从不占用银行、银号款项，在流动资金方面，有金、潘两家长期存款各百万两，还有经副理、股份同人等长期存款七八十万两。该号平日库存棉纱不下两万包，价值三百多万两，行市大涨时大量卖出，暴跌时大量买回，因属自己资金，不受负债牵制，吞吐能量庞大，动辄千包，同业中多窥视该号动态如何而随之进销。拥有洽源、晋丰两大银号为后盾，经济活动能量相当雄厚。

同益兴棉纱庄：该号位于竹竿巷中间，晋丰银号旁边，坐北向南，创办于 1931 年。股东范竹斋，经理任镜涵，资本十万两。范竹斋原为瑞兴益棉纱庄驻申庄负责人，瑞兴益营业发达，连年获得丰利，范竹斋也分得很厚的人股，羽毛渐丰，后来上海有两大纱厂股东与范合作，成立同益兴棉纱庄，范从瑞兴益辞职，加入了同益兴，所出股本占总额三分之一，并担任经理。不久，上海的两股东因故退出，改为范竹斋独资经营，由任镜涵任经理。1914 年第一次欧战爆发后，海运中断，天津的西洋棉纱货源奇缺，行情猛涨，当时英镑价格暴跌，日元随之下降，但日本与中国尚能通航，日本棉纱依然可以进口，同益兴乃大量购进日纱，及时结汇，使同益兴获得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好机会，因而发了大财。后来范竹斋也成为同益兴、靖源隆、余丰厚、余生厚四大棉纱庄股东，北洋纱厂经理，福安信托公司股东，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华账房买办，大房地产主，被称为天津新

“八大家”之一。

庆生号棉纱庄：该号位于竹竿巷东端，坐北向南，孙仲凯（元隆绸缎庄股东孙烺轩之子）独资经营，资本十万元，于 1926 年开业。经理李子滨、王子坡。庆生号棉纱庄成立后，由于孙家有大量款项长年存于该号，又有晋丰银号为靠山，资力雄厚，可与瑞兴益、隆顺、同益兴几大棉纱庄抗衡。经理李子滨与北洋纱厂章瑞廷、裕元纱厂卢宠之关系密切，长期大量购进北洋、裕元所产棉纱，后来裕元纱厂所产棉纱统由庆生号棉纱庄独家包销，得以操纵市场，左右行情，平日库存棉纱两三万包，吞吐能量惊人，各路大客商络绎不绝，营业大进，大有压倒瑞兴益、隆顺而称霸同业之势。孙仲凯被人们称为新“八大家”之一。

除上述四家有代表性的大棉纱庄外，竹竿巷内尚有纱布庄二十家，计有：隆聚纱布庄，资东卞涤新，经理暴子周；恒泰永纱布庄，股东章瑞廷，经理邱俊峰；同生源纱布庄，后改为广增祥，股东孙越桥、孙润生，经理徐浩如；华信成纱布庄，股东冯国璋；庆丰义纱布庄，股东为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经理黄献臣；锦隆纱布庄，由纪卫瞻（天津著名大绸缎庄敦庆隆股东，新“八大家”之一）独资经营，经理左秉衡；隆源纱布庄，股东卞润吾(新“八大家”之一)，经理冀鼐亭，与隆顺号仁记棉纱庄为联号；靖源隆纱布庄，股东范竹斋，经理靳馥卿；同昌源纱布庄，股东孙越桥（德和永杂货庄股东），经理孙哲忱；万德成纱布庄，股东李鉴泉，经理胡书林；万和成纱布庄（万德成联号），经理唐桐轩；合春纱布庄，股东朱、张两家合资经营；合泰纱布庄，股东朱、张两家合资经营，与合春纱布庄联号；通成兴纱布庄，股东刘子珍，兼经理；德聚纱布庄，股东为眼科专家田大文，经理齐馨圃；义庆祥纱布庄，股东张博言，自东自掌；荣华泰纱布庄，除经营纱布外，经营大宗浏阳夏布，畅销华北，经理阎某；同兴德纱布庄，股东王心容，经理李雨滋；三兴纱布庄，股东经理已记不清；厚记兴纱布庄，股东与经理已记不清。

二、银号八家

洽源银号：位于竹竿巷中间，坐南向北，与晋丰银号相对，由金桂山，安蓉臣、张云峰、郭矩卿合资经营，经理张云峰、郭矩卿，成立于 1903 年，资本十万元（1900 年庚子以前，钱庄皆以制钱或银两为资本），是天津钱业资本最大的一家。业务范围以存放款、代客办理收交申汇和买卖银元、银两为主要业务，其特点是不做投机倒把业外经营（如黄金、老头票、羌帖等投机倒把业务），市面上称为“做架子”的正宗派银号。该号历史悠久，资金雄厚，作风稳重正派，存款不求自来，放款严格审慎，来历不明的存款拒收，放款对象都是天津素有名声的大户，信用卓著，为西街银号正宗派代表。1905 年，洽源银号出资行平银十万两寄库银接英商办汇丰银行华账房，由经理郭矩卿继吴调卿为买办，开创钱业接办外商银行华账房的先例。

晋丰银号：位于竹竿巷中间，坐北向南，与洽源银号相对，开办于 1915 年。由“棉布业八大家”金桂山、潘耀庭、孙烺轩、胡树屏等四家合资经营，资本行平银万两，经理朱余斋、马桂山。与洽源银号同为西街银号具有代表性的两大银号。专营存款、放款申汇、买卖银元，不做投机倒把业外经营，该号办事规矩认真，对客户计算利息公平合理，不失正宗派风，每年盈利大部作为公积金，至 1934 年结束时，积累达一百多万元，为其他银号所望尘莫及。

瑞生祥银号：坐落在竹竿巷中间，股东是山东省章邱县孟家。原为山东“八大祥”绸缎

庄之一，后来改为银号，其往来户大多数为山东帮行业，与本地帮往来关系不多，于1934年前后歇业。

德源银号：在竹竿巷中间，坐南向北。为裕元纱厂经理赵聘卿独资经营，经理毛敏斋、倪歧山，属本地帮银号正宗派，以稳重可靠著称。

和济银号：右邻为德源银号。经理王景西、冯敬舆，虽属本地帮银号，但往来户以北京、深、冀州帮较多，与本地帮银号川换往来也不少。

德瑞银号：为“八大家”之一、正兴德茶庄穆家三门四代穆楚帆独资经营，地点在正兴德斜对过。于1940年成立，经理张俊岩（洽源银号经理张云峰之弟）后因经营不力歇业。

庆瑞银号：股东穆少兰，经理王捷帆。王为冀州帮出身，故往来户多以冀州帮为主，与本地商号及本地同业川换交往不多，被称为冀州帮银号。

宏利银号：位于竹竿巷西口，股东为山西人，姓名不详，经理为秦佩绅（天津人），其存、放款及交往各户皆为山西帮客商，为山西帮代表性银号。

三、大杂货庄两家

德和永杂货庄：位于竹竿巷中间，坐北向南，股东孙越桥、赵仲山，经理孙润生，专营南北杂货大宗批发兼营门市。这里每天顾客拥挤不堪，既有外埠客商来津购买大量红白糖，也有本市各区的大饭庄，大小饭馆、糖果店、糕点店，小商贩以及居民等。该号以销红白糖、冰糖为大宗，仅糖类每年销售额约在二三百万两银子，其他尚有大宗南北杂货，各种纸张、桐油、口碱、花椒、大料等，品种繁多。该店历史悠久，积累资金雄厚，与天津著名的大杂货庄德记、厚记、恒泰昌等被称为“杂货庄四大号”之首。

万有杂货庄（万自姜厂）：该号设在竹竿巷中间（小新街内），老“八大家”之一的杨柳青石家尊美堂石元士独资经营，经理齐烺臣、杜蕴山，成立于清嘉庆年间，为经营南北杂货的大批发商。石元士死后，子弟们恣情享受，开支浩大，使该店陷于外强中干之境。经理每年向东家交代账目，总是后账倒前账，好像年年赚钱，显得光彩，后来终因无法经营而歇业。

四、大茶庄两家

正兴德茶庄：清乾隆二年（1738），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回族穆文英来津落户，在北门外竹竿巷内，门牌二十九号，一个五间平房的门脸坐商内创办了正兴德茶庄，原名正兴茶叶铺，咸丰七年（1857）改为正兴德记茶叶铺，专卖名茶。正兴德可算是天津茶业坐商的元老，正兴德的茶叶是从南方自采，用船运回天津、自己配方加工制成红、绿、花、素茶叶。在茶叶名产区如福建、浙江、安徽等地均设有分庄和茶厂，可以直接采购、窨制。另在天津设立了制罐厂和仓库，在北京、保定、沧州、泊镇设有分号。经营的茶叶，不论高档还是低档，在配制加工中，均不用仔茶，这就是正兴德茶叶沏泡到底也不变色的奥秘所在，深受民众厚爱，以致声誉日隆，远销至“三北”地区，并操纵了华北的茶叶市场。1935年，正兴德茶庄进入了全盛时代，在罗斯福路三〇三号开设了正兴德第一支店，在官银号（北马路一号）开设正兴德第二支店。正兴德的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厂，继承传统的经营方式，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采买新茶、精致拼配、包装。以“绿竹”为商标，所熏制的中档“大叶”茶在市内最为畅销，日营业额高达3000余元，年批发、零售额在150万~200万元之间，盈利10万~20万元，居于天津五大茶庄——正兴德、成兴、泉祥鸿记、广裕、永安之首。

成兴茶庄：创建于 1936 年，初建时在北门外竹竿巷中间晋丰银号旁。成兴茶庄的组建是由正兴德茶庄的几名职工出了正兴德干起来的。经理是刘少波，开业时只作内局批发业务，后在正兴德东侧设立门市。成兴茶庄的独特之处是质量好、味浓、价格低。另外，还首创了袋茶，适用于特定场所推销，如杂货店、浴室、茶摊、旅店、水铺、火车等场所。袋茶的特点是：价格便宜、质量好、斤两足、经济实惠、携带方便，深受广大用户欢迎。为扩大销售，除批发部外，又创设了函售部和电售部。当时后起之秀的成兴茶庄轰动天津城，并在华北等地很有名望。为此，成兴又建立了一整套的推销网络，使袋茶行销至华北各地的城市和乡镇。1939 年，成兴在法租界天增里设立分号，营业额仅次于正兴德，居天津茶叶业的第二位。

五、津门最古老的烟铺

中和烟铺：为山西人刘某经营。它是天津最大最老的烟铺，专门销售关东烟叶、水烟、云烟、杂拌等。鼻烟、高中低档货品齐全，除销售本地外，外埠各地客商也来此大量采购，远近驰名。三十年代时曾重修门面。五层楼房，门满挂着“烟魁”两个金字竖匾一块（现陈列在天后宫内民俗馆里），两旁书有对联，说明其成立年月，1628 年明毅宗崇祯年代前后，在天津最老商店中，恐无出其右者。

六、麻袋庄

永和麻袋庄：店铺位置在竹竿巷西端临茶店口，坐南向北。它是由王永和艰苦创业干起来的。王逝世后，由后嗣王树华、王树荣、王树培兄弟三人继承此业。这个麻袋庄开始只有一间门面，原料是由各处沿街叫喊收集来的旧麻袋，经过加工整理、缝缝补补、拆大改小，然后出售，可以带来一两倍的收益。当时由于市间行使铜元，都用小麻袋装钱，后来造币厂开铸袁头银币，小麻袋的用量就更多了。每一小麻袋可装银币一千元，规格一致，除造币厂大量需要外，各银行、银号也大量使用。因此，永和麻袋庄缝补制小麻袋供不应求，业务日益兴旺。后来发展到向国外订购印度麻袋。由于盐场、粮行、斗店都需要大量的麻袋，永和麻袋庄的业务由零售逐渐发展到大量批发。后来王树华、树荣、树培兄弟三人分家，各立门户，仍用永和字号，另加华记和荣记，以资区别。1935 年，王树华又与四行准备库经理刘骞瞻合资十万元，成立华丰银号，使永和华记在资金方面更加雄厚，成为麻袋业中之翘楚，同业中皆以“麻袋王”称之。

竹竿巷的变迁

九一八事变后，时局动荡不定，战火连绵，日本唆使便衣队发动暴乱，工商百业备受侵害，许多工商业者纷纷向租界搬迁，企图借助外国势力的保护以求发展。原先活跃在竹竿巷里的各大商号也都先后迁入外国租界，如瑞兴益成记棉纱庄迁到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路与哈尔滨道交叉口处），改字号为泰丰号；隆顺号仁记棉纱庄迁往法租界五号路，改字号为慎益商行；庆生号棉纱庄迁到法租界四号路（今滨江道），改字号为和昌号；德和永杂货庄迁到和平路南头寿德大楼内，改字号为聚记号；洽源银号迁往法租界二号路（今长春道）四德里，改组为宏源银号；晋丰银号迁往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改组为庆益银号；德源银号迁到法租界六号路（今哈尔滨道）；和济银号迁至法租界三十号路恒和西里；经营三百多年的中和烟铺，因市面萧条而歇业。竹竿巷这个商业繁茂之地，随着商业中心的南移，失去了早年的风貌。

（作者单位：红桥区方志办）

无瑕街道的三座古庙与花会

刘培猛

传说金大定十二年（1172）时，东丽区无瑕街道的先人们就在此靠河沿岸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到元至大二年（1309），元军五千人屯田于直沽，自海河开河引水，利用海河潮汐涨落进行灌溉、冲碱，因河位于袁家村，故称袁家河。

随着漕运的兴起，到明初，条河十三庄（东套圈、王家庄、袁家庄、宋家庄、翟家庄、李家庄、小杨庄、大杨庄、苏家庄、郑家庄、于家庄、周家庄、田家庄）村民多养船货运或出海捕捞，逐渐形成规模。村民为出海的亲人们祭祀神灵保佑、护航避难，先后在袁家庄、宋家庄、苏家庄建起庙宇，利用庙会，使各种花会盛行起来。

一、老姆庙与花会

老姆庙坐落在无瑕街道老袁庄西，距海河北岸 200 米，旧时称海神庙，又称观音庙。庙内正殿居中供观音坐像，左文殊、右普贤、地藏王、十殿阎君，东南为送子娘娘，北侧南为天后圣母，东偏殿供奉关公、周仓、关平、药童。山门两侧站立着哼哈二将塑像。大门外侧两边角楼里分别供奉着土地爷和文昌帝君，院内中央是一座铁铸的“宝塔”，塔面漆成黑色、金色的纹饰，寓意“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老姆庙占地 22 亩，是出海渔民祭祀神灵的场所，为明代建筑。清康熙四十年（1701）重建，民国二十六年（1937）重修。院落四壁绘有 48 桢积德行善的彩绘。20 世纪 50 年代，偏殿及山门塑像被毁，1987 年普查时仅存正殿三间，门窗全无，仅有正殿壁画依稀可见。1989 年正殿亦全毁。1992 年，东丽区政府公布其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决定重建。

老姆庙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是天津古代漕运的重要史迹之一。随着时代的推移，海河多次改道，老姆庙原址漫进了海河里。重修后的庙宇又多次遭到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抢救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1993 年，在天津市文物管理处、东丽区人民政府、李庄子乡人民政府、老袁村村委会等有关单位的努力下，共筹资 70 多万元，按照清代的建筑风格重建庙宇，于 4 月 19 日破土动工，同年 10 月竣工，定名为“老姆庙”。重建后的老姆庙，占地 846 平方米，建筑面积 375 平方米，庙外广场面积 3000 平方米。庙内有正殿和东西两个偏殿，外观古朴优美；院内有两棵历史悠久的大枣树，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古树、名树。2016 年 12 月，被天津市命名为“天津市风貌建筑”。老姆庙又展昔日宏伟景象，功在当代，流芳千古。

老姆庙有着悠久的历史，农历二月十九和七月十三是群众自发的庙会的日子。庙会当天，人们早早地来到庙里参观。庙会上有来自津南、汉沽及本地的秧歌、高跷、舞龙、舞狮、宝辇等十多个花会队伍依次助兴表演，观者达五六千人，场面热闹非凡。

二、大宋娘娘庙与花会

明末清初，兵匪横行，洪水地震，灾害不断，民不聊生。为保佑乡民避难消灾、安居乐业，大宋庄村民聚各方财力，始建娘娘庙。

大宋娘娘庙坐北朝南，临近海河。清末民国初年，村民王永祥募资重修庙宇，重修后娘娘庙占地 108 亩，主体建筑面积 15 亩，分有山门、前殿、后殿、偏殿和围墙，供奉佛、道两教的 13 位神仙：山门内供奉四大天王，左为广目天王、多闻天王，右为持国天王、增长天王，中间供奉弥勒佛。前殿供奉天后圣母（俗称大奶奶），云霄娘娘、琼霄娘娘（俗称二奶奶、三奶奶）分坐两侧，其他还有送子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和窦二哥。后殿供奉老姆（南海观音骑狻），两侧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偏殿供奉：左边财神、药王、柳仙，右边韦陀、龙王、小圣神。围墙墙面绘有二十四孝彩画。山门外有旗杆两根，高 15 米；台阶 5 级。娘娘庙山门外旗杆是典型的北方佛教寺庙布局。旗杆处可以拴船。因为海河历次大洪水，水流“冲北淤南”，至今河南（今津南区）淤滩地千亩有余。

娘娘庙外有庙属耕地，庙内主持僧人把耕地租给村民耕种，收取租金。庙东北边有圆坑，常年有水。庙内僧人、附近村民都采此水饮用。后来传说冯玉祥部下又在庙前另挖了一个大水坑储水，供人畜饮用。

娘娘庙前殿于 1951 年被拆除，1970 年又被拆去后殿，改建为大宋小学。1992 年农历二月十九为观音诞辰日，数名村民在娘娘庙原址前上香祈福，香火不断，至深夜 11 点，村民众聚。此举唤起村民重修寺庙、重塑神像的想法，于是村民们自发集资，出力将寺庙修葺一新。

2009 年 9 月 9 日，由大宋村村委会发起组织、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富民公司负责建设施工，村民出谋划策，娘娘庙另选村西福地重建。重建后的大宋娘娘庙距海河百余米，占地 50 亩，庙宇占地 4 亩。依次布设山门、前殿、后殿，配有东西殿和僧房。雕梁画栋相望，青松翠柏拱卫，法相庄严，金碧辉煌，人流不断，香火旺盛。随着庙宇的兴建，庙会、花会也兴旺起来。本村的法鼓、旱船、花棍、秧歌、吹会等成为庙会活动的一景。

娘娘庙每年有三次大型活动：农历正月十六，娘娘出巡回来，俗称接驾日；农历四月十六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庙会日；农历六月十九，是重建后的迁建纪念日。每逢庙会，各会汇总选出总会主持人进行摆会，然后各会依次面向庙的方向给诸神上香磕头行礼，事后打场子表演节目。客商云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周边十几个村的村民前来赶庙会，北边的赤土、山岭子、军粮城等地村民乘车前来，东边的北塘村等沿河村民乘船至此，烧香许愿祈福。庙会前夜夜间便有许多外地香客在庙外等候，香火旺盛不断。

三、苏庄妈祖庙与花会

苏庄妈祖庙始建于清道光十一年（1832）。1939 年农历七月初四晚，苏庄村突遭大水，汹涌猛烈的洪水冲倒了庙房。待洪水退去，村民立即集资重修该庙。庙宇修好后，村民一直小心地清扫，尽心尽力保护。每年接驾仪式时，人们烧香磕头，诵念护海神妈祖普照：大慈大悲，逢凶化吉，风调雨顺，遇难成祥，一顺百顺，买卖兴隆，一网两载，顺风相送。翌年，以张玉镇为首的老会头操办募捐事宜，加盖主殿和东西耳房，后又在东西两侧加盖土木结构房屋 6 间，全庙面积达 1200 平方米。

2007 年 11 月 11 日，在保留原庙旧貌的基础上，娘娘庙随整体撤村，选址津塘公路十号桥以北破土建起新庙，于 12 月 20 日竣工。新庙建筑面积 592.62 平方米，东西 13 米，南北

12 米，高 13.2 米，主殿一层 6 米，附殿二层 6 米，第三层 1.2 米。庙前广场南北长 39.9 米，东西宽 35.4 米，面积 1412.46 米。主殿室内顶绘有八卦图，东墙绘有苏庄原貌图，西墙绘有八仙过海，北墙绘有碧海蓝天。房盖装饰二龙戏珠等吉祥物，大门西侧有棕色半圆形大理石对联。上联：天道圣母兴邦佈泽慈心重；下联：后佑黎元临河蒞江恶浪平；横批：天后圣母。新庙所用建筑材料为青砖、青瓦、沙子、水泥框架浇筑，外墙用保温材料，水泥抹平面，整体刷灰色涂料。

2008 年 2 月，由于迁村并点，中国一重厂房占地，苏庄庙西修建公路，南建排水站，全庙只剩下 600 平方米。后邀请浙江宁寿庙佛菩萨泥塑装金上彩师傅任甫康，用了三个月时间塑造了云霄娘娘、海神娘娘（天后圣母）、送子娘娘等，于 2010 年 7 月 28 日（农历六月十六）在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大典。每逢初一、十五，庙门大开，十里八乡的男女香客前来进香，祈求平安。

苏庄花会明末有吹会，到清道光三年（1823）始建宝辇，光绪七年（1881）更新过一次，民国二十九年（1940）重建，文革期间被毁，1986 年 6 月 24 日重新兴造，2010 年全面修缮。道光七年（1827），随着宝辇圣会参与庙会活动，法鼓会、小车会伴之。近年来，苏庄青河高跷成立，并参与庙会活动。

（供稿单位：东丽区方志办）

（上接第 33 页）

能导演话剧，又能编写话剧，同样也能改编某些国外知名剧本。没有一定积累，后期改编的《新村正》也不可能重新再火。《新村正》剧本的加工由张彭春与万家宝共同完成。张彭春的导演，张平群、伉乃如、吕仰平、严仁颖等在话剧舞台上的表演与林徽因的舞美，使得剧作在舞台上的呈现接近完美。先生的艺术主张是演生活，强调导演的权威化，且对演员相当严格。“你演他，跟你是他！”话剧舞台上的两个不同理念，更早的“演人物与演生活”亦是不同的理念，作为话剧非资深观众的笔者，只能妄言没有演人物的体验，是演不好生活的，但生活离不开对多种事物及人的观察与体验，经历的事多了，才有演好戏的资本，作为话剧导演的张先生必须得让其演员在吃透剧本的同时，既了解人物又了解生活，着实不易！在上文提到的巩先生的文章中还曾提及，“《财狂》的今本却由编者张彭春教授和林徽因女士设计舞台布景：布景是立体的、全体的”。[1] 可见先生的通才！

天津博物馆智启津沽展之南开大学话剧《新村正》

（供稿单位：和平区档案馆）

[1]《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剧论卷》第 334 页。

精武会从天津走向世界

王洪海

英雄故里

创办精武会的霍元甲是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人，清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 年 1 月）出生在小南河。在宋代，海河是宋辽两国的边界，地处边防的小南河成为宋军军寨，从此，这里崇尚武术之风便盛行开来并成为传统。霍元甲秉承家学迷踪拳，后来又吸纳各派精华，将迷踪拳创新为迷踪艺，并走进上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霍元甲故乡精武镇小南河村牌坊

1984 年，由于电视剧《霍元甲》和小说的宣传深入人心，全国出现霍元甲热。1989 年，在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 80 周年之际，地方政府在英雄故里小南河村建霍元甲故居和陵园，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是年，天津精武会也在小南河村成立。霍元甲武术学校也在同年开始筹建，校址在小南河村。1999 年，霍元甲武术学校更名为霍元甲文武学校，校长由天津武术队南拳王郎荣标担任。天津精武会和霍元甲文武学校继承霍元甲精神，秉承“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理念，把精武事业越办越好。

2018 年 8 月，地方政府新建了天津市精武体育会会馆，并举行隆重的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邀请国内外部分精武会会长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2018 年 8 月 15 日，天津市精武体育会会馆揭牌

霍元甲文武学校以传承霍元甲爱国精神为己任，追求“乃文乃武，惟精惟一”。至 2018 年，学校已培养出 200 余名全国比赛冠军，1000 余名天津市比赛冠军。有 12 名学生晋级为国家健将级运动员，69 名学生晋级为国家一级运动员，650 名学生晋级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学校已成名副其实的“冠军摇篮”。

精武会的初始阶段

霍元甲创办上海精武会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精武会的创办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中国武林界，从此打破狭隘的门派观念，变张家武馆、王家武馆等无以数计的家族门派武馆为中华民族的大武馆。精武会倡导广泛团结武林英豪，停止因门派之争而引发内斗，把武术这一国粹奉献给国人，用以强国自卫，雪洗“东亚病夫”耻辱。

精武会的初始阶段很简陋，是在上海闸北区王家宅租房。精武会从这里启程，开始致力武术救国的艰难跋涉。农劲荪是同盟会成员，与陈其美关系密切。孙中山最得力干将陈其美对精武会寄予很大厚望，希望精武会能在“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上海有很多热血青年争先加入，后来都成为精武会骨干。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陈铁笙、罗啸璈等一大批人，大多都是富家子弟，生活优越，但他们都有知识，有志向，从精武会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纷纷加入该会。

霍元甲遇害身亡后，精武会处于风雨飘摇中。为使精武会能继续生存，农劲荪命刘振声火速回北方去请霍元甲的弟弟霍元卿及次子霍东阁赴沪，顺便请几位武林高手前来协助，这才稳住阵脚。

霍元甲画像

精武会历经两年艰难历程，终于培养出一批初级班学员，这是精武会创办成功的重要标志。第五年时，精武会第一批高级学员毕业，有卢炜昌、陈公哲、姚蟾伯、郑灼辰、宁竹亭、黎惠生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精武会精英，为精武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精武会成立五年后，首届高级班学员毕业。精武会已有可观成绩，入会者越来越多，会所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便在北四川路崇明路口成立第一个精武分会。上海的第二个精武分会也适时诞生，霍东阁在《精武本纪》里说，“沪城第二分会成立于新北门，暂假煤炭公所为会址。技击部长卢炜昌先生命东阁主其事，谫陋如予，曷足任此，亦为勉尽绵薄之力，以期无负诸君而已。”第三个精武分会成立于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山东会馆内。至此，上海滩的精武会已有 4 个。之后，精武会开始走出上海，相继在绍兴、南浔、松江等地成立精武会。

1918 年，精武会派员沿长江而上，在九江成立精武会。是年夏，卢炜昌、陈公哲赴汉口游说，向各界巨子陈述精武宗旨，宣传武术国粹的重要性，使听者动心，并立志在汉口发起精武。经组织者紧锣密鼓筹划，并由金星公司慷慨借地，建造操场，又函请上海精武总会教练李健民前来任教。7 月 7 日，汉口精武会正式成立。

精武会的壮举已经震动广州。上海精武会派叶凤歧、杨琛伦二位武师前往广州，向广东镇守使李福林详细描述上海精武会宗旨与活动状况。李福林本来就会武术，早就对国家积贫积弱状况忧心，听二位武师描述后，立即热血沸腾，希望马上在广州成立精武会。上海总会得此消息后，万分欢喜。经协商决定，由总干事陈公哲、姚蟾伯，技击部主任卢炜昌，书记陈铁笙四人前往广州协助筹备精武会。

1919 年 3 月 25 日，广州《天声日报》载

文：“广惠镇守使李福林提倡技击不遗余力，此国粹小可强健一人之身体精神，大可实足发扬国威，固宜一致提倡。”《国华报》载文：“军学两界组织精武体育会一事系由李福林等发起。闻会长一席已推定为李福林、魏邦平。其余莫督军、翟省长、教育会长、救济会长、炮队营长，滇军团长及各界名流均为提倡人。已定于明日在海珠戏院开成立大会。”

广东精武会在广州成立后，影响很大，周边的香港、澳门、九龙、佛山、香山、肇庆、新会、汕头等地也纷纷办起精武会。加上原有的上海、绍兴、南浔、松江、九江、汉口等十余个会所，精武会几乎遍及江南各地，会员达数十万众。

上海精武会为充实广东精武会教练队伍，派霍东阁等武术家前往任教。霍东阁在任教期间，有一位弟子叫邵汉生。9 岁的邵汉生跟霍东阁学谭腿与迷踪拳，后来又拜北派名家孙玉峰和罗光玉学罗汉拳与螳螂拳。邵汉生是饱学北派拳术的南方名家，后来在香港从事电影业，集制片、剧务、主演于一身，共出演过 70 多部影片。邵汉生成名后，收过一个徒弟叫李小龙。李小龙从师傅那里深得北派拳术奥妙，尤其腿上功夫练得精到。后来，李小龙又学咏春拳，南拳北腿功夫集于一身，在美国发明创造一套属于自己的功夫——截拳道，将中国功夫通过电影传遍全球，风靡全世界。

精武会走出国门

1920 年，上海精武会开始沿海上古丝绸之路向海外发展，派遣“精武五使”下南洋，宣传精武要义，表演精武拳术。五位特使是罗啸璈、黎惠生、陈公哲、陈士超、叶书田。

精武五使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后，受到当地华侨政商、各界名人的热烈欢迎。精武五使借场地表演拳术，抓住机会大力宣传，引起很大轰动。他们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开始收学员传授武术，习武之风很快在华人圈蔓延开。1921 年 9 月，马来西亚第一个精武会——“雪兰莪精武体育会”成立。

1921 年成立的马来西亚雪兰莪精武会

雪兰莪精武会成立后，除积极发扬武术外，还致力于提倡健康文化艺术及体育活动。会中有中英文补习班、书画、棋艺、音乐、戏剧、摄影及各种球类运动。此外尚有服务团，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

雪兰莪精武会越办越红火。因学员成绩日新月异，影响极大，精武会得以迅速发展。后来，马来西亚先后成立 20 多个精武会，有怡保、槟城、金宝、太平、森美兰、马六甲、砂勝越、实兆远、和丰、麻坡、安顺等城镇。

怡保精武会成为马来西亚精武总会。马来西亚精武总会为一个合法的注册团体，每两年由各友会派出 8 名中央代表选出理事会。理事会也定期召开会议研讨各项事务，包括研讨每两年由各友会轮值的全国精武嘉年华会。马来西亚精武总会及下属各分会已经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组织，深受各界尊重。

此后，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英法殖民地国家都建立起精武会。这些海外精武会，继承上海精武总会传统，称霍元甲为精武元祖，挂霍元甲像，武术拳种及会旗、会徽、宗旨、章程等基本不变。世界各地精武会依然是“以国术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

事实证明，上海精武会向海外发展的举措是成功的。

霍东阁在广东精武会任教练期间，曾受海军高薪聘请。是时，孙中山也定居广州，掌握着军阀陈炯明。陈炯明手下有海军，温树德任海军司令。温司令统领战舰十余艘，舰上官兵加陆战队、警卫营共一万多人。温树德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请霍东阁到海军总部任技击教练。霍东阁知道是孙中山的部下，欣然应允。

霍东阁经验丰富，教授得当，没多久，海军官兵人人都会打一套拳，练一套兵刃。司令温树德高兴，在孙中山面前夸耀霍东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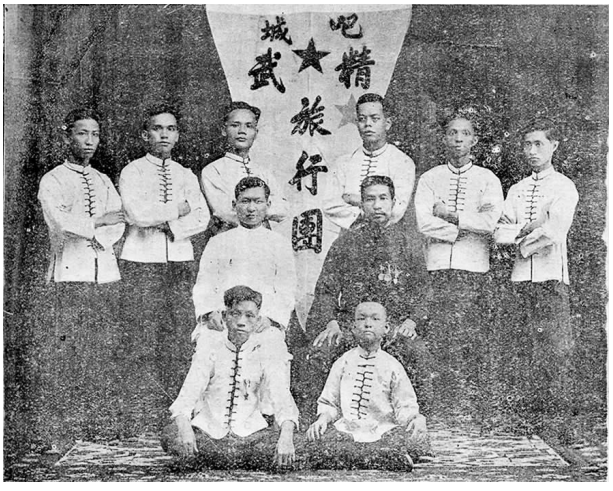
1922 年 6 月 15 日夜，广州军阀陈炯明突然发动政变，令叛军包围总统府，悬赏二十万元刺杀孙中山。孙中山从侧门逃离总统府，躲过一劫。霍东阁震惊，更十分懊丧，辛辛苦苦教授的官兵，居然都背叛孙中山。他仰天长叹，愤然离开广州。经多日深思熟虑后，他决心下南洋去开创精武事业。

霍东阁在《南溟精武大事记》序文中说，“余之效死精武事业，初不过欲继先君创始之志耳……民十二年春，余以南游意请教炜昌、啸璈两公，公曰善。即而曰，刻下英法属各会教练欠缺，君愿往就，当为介绍之。余曰，余所愿往者，非已有精武之地也，余愿往荷属。两公曰，有把握乎？余曰，卧薪尝胆，聊以见志耳。”

是时，英法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已有精武会，霍东阁不愿省心省力前往当教练，却要独闯荷兰殖民地爪哇岛，到更远的南洋岛国去开创精武新天地。

1923 年 5 月 24 日，霍东阁乘海轮从香港出发，6 月 12 日到爪哇岛泗水市。霍东阁在南洋烟草公司落脚，开始拜访当地各界名人和中国驻爪哇泗水领事，宣传精武。忙碌数日，收效甚微。霍东阁另辟蹊径，干脆从南洋烟草公司入手，义务传授职员工人武术，并讲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乃是中国国粹。果然，很快有人爱上武术，身体精神都有显著改观。有华人学校开始聘请霍东阁任武术教练，教学生习武。一日，泗水中华学校因办学经费欠缺，特意在加冷眼影戏院募捐演出，霍东阁以“醉拳”登台助演，不想竟收到意外效果，轰动泗水市。真是“一拳定乾坤”，霍东阁抓住这一良机，向来访的诸家记者大力宣传精武要义，借报纸力量广而告之，习武之风在爪哇岛泗水城逐渐兴起。经多方努力，南溟泗水精武会于 1924 年 8 月正式成立。

霍东阁乘胜前进，大展宏图，借助电影新科技手段，将精武会演练内容拍成电影在爪哇岛巡演，吸引全岛人的眼球，宣传效果显著。



巴城精武总会旅行团（黑衣者为霍东阁）

1925 年年初，霍东阁在爪哇岛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成立巴城精武总会。当时的《大公商报》载文说：“精武体育会自去岁在巴城成立总会以来，会务蒸蒸日上，除在巴各华校业经全数添授精武式之国操外，如西冷、芝利昆、巨港具已成立分会。其他如三宝垄、梭罗、万隆、北加浪等处，现正在紧张筹备中，很快便有成立分会之消息。”

霍东阁凭一己之力，仅用 4 年时间，在爪哇岛创办 8 个精武会。他将精武事业沿海上丝路在南洋发扬光大，为精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精武之花开遍全球

霍元甲创办精武会，是在中华民族最屈辱的时刻。当时，霍元甲的志向是，唤起民众崇尚武术，远离鸦片，使自身体魄强健，共同雪洗“东亚病夫”耻辱，使国民都有保家卫国的本领。霍元甲怎么也不会想到，精武会走到今天，居然被世界人民广泛喜爱。2020 年，精武会已遍布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 30 个国家和地区，会所有 79 个。

2020 年，精武会已经遍及世界 30 个国家和地区，会所有 79 个

香港精武会副主席李孝全精通八卦、迷踪和罗汉拳，其徒弟徒孙遍及全球很多国家。李孝全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菲律宾等国的多个城市设有精武会。这些精武会都是由他的徒子徒孙任会长，去经营，他是总监，巡回指导。从会长到会员，有很多都是外国人。

佛山精武会聚集的外国友人很多。佛山精武会秘书长梁旭辉有个无忧堂，大厅中央悬挂一匾，上书“无忧堂中国总部”。显然，佛山精武会和梁旭辉师傅的无忧堂，正在走出国门，拥抱世界。2018 年 10 月 29 日，无忧堂举行洋弟子拜中国武术家为师仪式。30 多名外国人，非常虔诚地膜拜中国师傅。洋弟子很激动，说自己学中国功夫十几年，一直没正式拜师，有些自卑，今天很高兴，觉得终于成为中国功夫正式的一员了。数年来，无忧堂教出的洋弟子已有 200 多人，遍及欧美亚非各国。

在佛山精武会致柔社，南美洲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武术爱好者在那里学习中国武术。外国友人说，他们到中国寻找精武会，就是要学会真功，回去带动同胞一起强身健体，只有体魄强健了，才会有幸福生活。

天津精武会霍元甲文武学校每逢寒暑假，有很多外国人到这里练武。因为霍元甲文武学校影响越来越大，被文化部定为进行武术文化推广交流的“涉外培训基地”。每年有两批学员，每批 40 人，学期 3 个月。霍元甲文武学校培养出的中外学员，有不少在世界各地精武会任教练，也有部分学员在国外办起精武会。

纵观精武现状，不禁令人想到，精武会走出国门的同时，各国爱好武术的人也纷纷来到中国寻找精武会，这成为一种良性互动。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正在借助“一带一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走向爱好和平、追求健康的世界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西青区档案馆）

宁河人不能忘记的一中校长——杜书田

孟昭林　王士兴

杜书田，字心耕，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宁河镇，系清初重臣杜立德裔孙。

杜书田

杜立德聪颖慧智，博学多才，屡建功劳，被康熙帝视为股肱。其家族显赫一时，在宁河镇曾建有杜立德相国府，“崇隆栋宇连高厦，侍从纷纷耀车马。重户深扃挂兽环，飞檐直耸排鳞瓦”。豪宅恢宏，生活奢华。时过境迁，杜书田出生时，杜氏家业已衰败，杜相府最后成为齐家府，但家族崇尚读书的习惯没有改变。

弃官不做　矢志教育

杜书田从小在宁河镇私塾读书，后考入学宫，与宁河的齐燮元是同科秀才。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如果科举之路能延续，很可能走上仕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颁布停止科举的上谕，在中国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杜书田便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1906年创办）。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凭着与齐燮元的关系，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因其经历了晚清的腐败和民初的混战，已冷于仕途，不愿步入宦海，毅然辞官不就，矢志教育救国。于是到芦台或受聘于童生私塾，或受聘于洋学堂，教书为业。他工书擅画，书法山谷，笔力遒劲；画宗板桥，尤善作竹，曾在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主持的天津书法评坛挂笔单为书法家，在芦台挂出“力行斋”的牌号，以卖书画为生。曾与在芦台药王庙园子居住的晚清大儒高赓恩（1840—1917）和同科秀才、民间著名中医李心斋（1881—1943）过从甚密。一次高赓恩赠李心斋一条幅：“试问朝中做宰相，不如林下为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白昼眠。”杜书田为条幅配画墨竹，并题诗曰：“夕阳芳草画桥东，榆柳中间一径通。此处居人知不俗，几竿修竹绿梳风。”

期间，齐燮元等权贵荐其出任冀东道尹，被其婉拒。后又荐其管理河工，其认为这是可以为民造福的差使，遂去就任，但实际掌权人营私舞弊，他赴任仅一年反赔了160块钱，从此对政界彻底心灰意冷。

荜路蓝缕　创建校园

1913年，实业家芦台人刘彭寿（字壬三）

首倡，在芦台创办宁河中学校（芦台一中前身），为私立学校，首任校长张作楷（字世阁）。1919 年 3 月，张世阁年事已高，辞职隐退。经学校董事会推荐，直隶省教育厅任命杜书田为宁河中学第二任校长。

学校初创时，借用民宅为校舍，“湫隘而近市嚣，识者病焉”，无发展余地。杜书田莅任后，不遗余力，经营校务，学校声望日隆，生徒日多，原有房舍不敷使用，亟须新建校舍，扩大办学规模。他积极游说本县齐燮元、刘壬三、齐翰卿、刘子明、白宝山、苏锡麟等军政要人，陈明兴学办校乃造福桑梓。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经过 5 年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上述军政要人的支持，他们捐出不同数额巨款，仅齐燮元一人就捐款 2 万元。筹到资金后，杜校长又忙于相地鸠工，1924 年上半年，新校舍终于建成，即今芦台一中校园。地势宽敞，环境幽雅，校舍栋宇崇隆。学子“爰居爰处，专心致志，因其所也”。

校舍落成，设备齐全，以为尔后可以安心办学了。但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学校三遭兵燹，七次搬迁，校园中原有设施及师生个人物品被军人抢掠一空。为不误学子学业，杜校长虽多次抗争，但无济于事，只得求人，找关系，数次变换地点，甚至将自己在宁河镇南街的家宅都腾出作为校舍，使学生有学习的一席之地。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未言放弃办学。

杜校长掌管学校时，学校尚属私立性质，其经费虽有学校董事会筹集，但远不能满足学校所需。为此，杜校长每年都要花费大半年时间外出募集资金。有人说他像行乞兴校的武训，又像化缘的僧（侣）。他一心只为兴校，不管别人说什么。他的岳父，晚清举人齐尚之还支持他 800 块钱用于办学。他本人将每月的薪水拿出一部分用于学校。1938 年学校改为公立，经费问题才有所缓解。

广延人才　提高质量

为提高教育质量，杜校长四处奔走，凭个人人脉，广延群俊，八方之士，多来应聘。他聘来的教师，多是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毕业且有多年教学经验者。教务主任唐紫园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后曾任宁河县教育局长。1946 年来校的美术教师华宜玉系京师美专（现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是当今中国水彩画坛享有盛誉的女画家。教务主任佟迪光兼数学教员，杜校长外出“化缘”期间，全仰仗他管理学校教育教学，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庶务主任梁郡勤一心为校，忠心耿耿，校长外出时，他全权管理学校财务和事务。国文教员王苓臣是前清举人，学识渊博，落笔成章，是教古文的一把好手。

芦台一中校园内杜书田塑像

办好一所学校，除了有好教师，还要有好教材。当时学校课程齐全，语文教材是学校自选编印的古文为主体的讲义和《开明活页文

选》，数学、物理、化学和世界地理使用的是外文课本，1928 年以后，所用课本则是从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局编印的教科书中按科抽选的。在日军侵略和其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把当局编印明令各校使用的课本买而不用，只是上面来人检查时做个摆设。

杜校长既重视学生品学兼优，又重视学生工作能力、生活能力、动脑能力的培养。在杜校长领导下，教务处、训育处、庶务处各司其职，严格管理。学生的学业成绩考核、操行品德考查、体育考查、考勤及升留级、毕业等方面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其中“奖励学生办法”有四条：“一、学生学业成绩取列第一名并操行列甲者免学期、宿费一学期；取列第二名并操行列甲等者免学费一学期；取列第三名并操行列甲等者免宿费一学期以资鼓励。二、班长、室长、各会会长劳怨不辞、卓有成绩者得由学监酌加操行分数。三、每月各学科会考至学期之末，凡二次取列第一者或一次第一、二次第二者均酌给奖品。四、凡能制出新样手工或标本送交科学室保存者均酌给奖品。”

学校制定了礼堂、教室、宿舍、操场、饭厅、校园内外等一系列规则，要求学生熟记并遵守，如在校内见师长要行礼，见到同学要致意，到校必须穿制服且衣貌整齐端正，不准留长发、留胡须，不准在校内吸烟、喝酒、吃零食等。当时从校长、教师到学生一律剃光头（学校无女生），这不是什么宗教信仰，更不是什么“光头党”，而是为学生节省梳理头发的时间，一心一意用在学习上。

对严重犯纪的学生严肃处理。1943 年，有几个住校生在校打麻将，被校方发现后，立即写出布告：“开除校籍，以儆效尤”，不搞“下不为例”。

勤慎朴洁　和睦“家庭”

当时学校礼堂讲台后墙上悬挂一块大匾，上书“我们的家庭”五个大字，下款是“杜书田题”。教务处主任佟迪光解释：“家分三种，一曰身家；二曰国家；三曰校家。就是这个‘我们的家庭’。”其含义是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都要以校为家，维护学校荣誉，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都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每年学校成立日杜校长讲校史时，都要强调学校创业艰难，来之不易，“我们要爱护她，发展她，她是我们的家庭”。

杜校长亲自制定了“勤、慎、朴、洁”的校训和“本校职教学生夫役励行标语：我们学校复活的真精神，就是不要说，只要做。学校事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要我们做”。为芦台一中的校风奠定了基础，确定了学校文化的核心。

他还为学校写了校歌：“广厦平开芦水岸，大庇寒士尽欢颜。好从实际求生活，不把虚名误少年。勤劳作，苦钻研，准备身心发展。前途努力莫迁延，三载一瞬间！”歌词表达了杜校长对学生热情鼓励和殷切期望，经当时音乐教师李仲甫谱曲传唱。

崇尚新学　佑护师生

杜校长治校理念深受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影响，生活上讲究艰苦朴素，教育上主张“教、学、做合一”。

杜校长掌校时，学校学生会组织有很长一段时间叫“宁中市”，学生会主席就是“市长”，学习部长叫“教育局长”，生活部长叫“民政局长”。学生的很多事情由“市”里管理。如各学科研究会由“教育局长”负责管理。“市”里

还开办了“宁中银行”，其发行的纸币可在“宁中商店”购买文具、纸张和生活用品，也可在“宁中伙食团”交纳饭费。纸币是学生将钱存入“宁中银行”后兑换。“银行”和“商店”的经理、会计、出纳、售货员均由学生轮流担任。这种模式培养了学生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和服务精神。

学校还实行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杜校长为解决平民百姓子女上学问题，在学校东侧的李公祠开办了一所附属小学，由教务主务佟迪光管理，教师则由学校高年级学生担任，这不仅解决了师资问题，还让学生“教学相长”，锻炼了能力。

为使教育与学生的出路相结合。1938 年，杜校长在校内开设了“高级商业职业班”，凡四届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材。

学校开办之初，只招男生不招女生。杜书田任校长后，了解到一部分女孩有求学愿望，遂招了部分女生与男生同室上课。由于当时学生年龄较大，出了恋爱现象，遭到镇上封建势力的冲击，杜校长只好劝退了女生。1944 年，东大营校舍建成后，杜校长顶着压力，重招女生，为避免上次的问题重现，在芦台中街西头（旧盐母庙）单独设女生部。因停招多年，积压了差不多一代的芦台女孩，故同时进入中学女生部达 58 人之多。她们有的是亲姐妹、有的是姑侄同室上课。1945 年冬，女生部迁到东大营校区，仍男女分班上课。

战乱时，学校一度迁到宁河镇办学，杜校长在宁河镇曾主持筹建宁河女子高级小学和宁河女子职业中学。

据 1942 年芦台一中毕业的崔胤发回忆：“处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校长实在是不容易，学校里有日本教官监督，社会上有不少所谓绅士找你的麻烦，特务伪警更是经常捣乱，我们杜校长都一一去对付。但他不向恶势力低头，而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制约他们。”1941 年秋，大地主李竹轩（任芦台镇长）送粮车夫把一中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没人惹得起镇长，而杜校长敢和他斗，最后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分别给各班学生道歉，讨回了公道。

当时伪县府经常召开什么地方陷落的庆祝会，都要通知学生参加。一中学生参加这些活动，谁也不愿写发言稿，杜校长就指派佟主任让讲《孟子》课的齐先生写一份引经据典之乎者也的文言稿，让学生代表去念，谁也听不懂讲的是什么。

当时一中校园已经有了革命的火种。1938 年，语文教员刘哑夫带领部分学生投奔解放区。1941 年，日伪当局逮捕了齐兆伦（共产党员、学生）等师生，齐兆伦被释后去了延安。杜赞贤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到崔庄、万庄、闸口一带散发反日传单，张贴标语。伪县政府经常到校检查，时不时就来校折腾，把老师扣押起来，或把学生呵斥一顿。杜校长总是站在师生一边，帮助师生应付。

杜书田一生潜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本县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奠基者，被师生们誉为芦台一中的张伯苓。1948 年底，杜书田因年迈辞职，计掌校 30 年。正如芦台二中老校长于化一所言：“杜校长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宁河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材，真不愧是宁河的教育家。”并题诗赞曰：“苦育英才三十载，辛勤创业费筹谋。化雨春风桃李笑，程门马帐姓名留。品若伯苓孚众望，功垂宁邑耀千秋。传薪不愧先驱者，一片丹心孰与俦。”

杜书田退隐后，在京津两地儿女家颐养天年，1956 年病逝，享年 76 岁。

（作者单位：宁河区档案馆）

召公立燕与邦均地名的由来

王　辉

西周时期，现今蓟州区所在地域隶属于召公奭建立的燕国，境内发现许多遗址以及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铜鼎和铜簋、燕国货币明刀、燕国鬲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燕国是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范围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它始建于公元前1066年，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的全过程，传了四十二世，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它于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年）被秦国所灭，立国长达844年之久，比周朝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东周灭亡后，燕国还存在了34年。因此，司马迁说燕国是在姬姓诸侯中最后灭亡的。

燕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召公奭，在周初政治舞台上，是一位显要的人物，他历经了文、武、成、康四代天子。燕国虽然是他的封地，但他并没有到任，而是由他的第一个儿子克来燕国主持政务，他仍留在周王身边，协助周王治理国家。

关于燕国的始封地众说纷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王彩梅著《燕国简史》将这个问题归纳为十种说法。其中的“燕山之野”说、“蓟县”说、“殷代故国旧址”说，指的都是今蓟州区。因此，蓟州区与召公立燕有着不解的渊源。

燕国名称的由来与燕山有关，据《日下旧闻》引《史记正义》曰：“召公始封盖在北平无终县，以燕山为名。”《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清康熙《蓟州志》也记载：“燕山在州东南五十五里，为蓟、遵、玉接壤处，山脉自太行山而来，迤逦而东，直抵海岸，燕国由此而名。”

关于燕国最初的都城，也与今蓟州区有关。一是说，燕国最初的都城就是无终邑（今蓟州区），另一说法就是蓟州区城西13公里处的邦均镇，这在近年来的考古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在邦均附近发现了多处周代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其中有张家园遗址、邦均西周遗址和墓葬群、邦均西门外青铜时代遗址、南城子遗址、前向阳遗址、许家台遗址等。这些周代的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铜耳环、迭唇柱足陶隔、夹砂红陶釜、夹砂灰陶粗绳纹折档鬲足、宽沿带棱鬲口沿、鼎簋青铜礼器、带钩、铜泡等；战国时期的文物有泥质灰陶豆、豆把、豆盘等。特别是张家园遗址出土的底部铸有“天”字的铜簋，被确认为是周人的一个氏族集团的族徽。

邦均西周遗址和墓葬，位于邦均镇东南1000米处，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1986年和1987年分两次进行试发掘，发掘面积约3700平方米，发现西周前期的房址坑穴。还发现西周中期墓葬6座，出土了鼎簋青铜礼器，铜鼎有铭文“十乍氏鼎”，铜簋的腹底有铭文“戈父丁”，另有东周时期墓葬46座。西周带铭文的铜鼎和铜簋，很可能是周武王赐给召公奭的两件稀世珍宝。该遗址仅发掘十六分之一，就出现如此众多的文物，那么还有多少秘密埋藏在这处遗址之中呢？这还需后人进行深入探究。邦均北部有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邦均汉墓群，位于天津城北蓟州区邦均镇盘山南麓的丘陵地带，分布范围约1平方公里。大部分是长

方形单室砖墓，也有的墓有前室、后室和耳室。随葬品有罐、盘、耳杯等陶器，还有半两、五铢等铜钱。已发掘的最大的一座墓长 10 米，宽 6 米，随葬品数量也较多，除陶器外，还有奁、熏、灯、龙柄勺及铜镜、玛瑙珠等。邦均还有一座西周遗址，面积约 6 万平方米。这里是西周前期的居住址，西周中期以后至战国的墓葬区。出土有铭文为“十乍氏鼎”的青铜鼎、铭文为“戈父丁”的簋和其他陶器、铜器等物。

邦均镇历史悠久。“邦均”地名之由来，说法很多。其一，邦均原名“邦君”，意即邦国之君。据历史文献记载，周文王临死时，嘱托其弟召公奭辅佐武王。武王灭商后，就封他的叔父召公奭于燕，以报答他的辅佐之恩。于是，召公在这里建立都城，取名“邦君”城，后来演衍成了“邦均”。其二，邦均原名“商君”，相传，秦国改革家商鞅曾在此宿店，故名商君店，也意指商贾云集之地。唐太宗东征高丽，途经此地，问大将军薛仁贵这里叫什么名字，薛仁贵回报说叫商君店。李世民一听“伤军”二字，眉头一皱。这出征未捷先伤军未免有点不吉利。不行，得改名。改叫什么呢？李世民说，改成帮军吧，帮助我大军东征成功。故改名“帮军店”。东兵马、中兵马、西兵马、东草场、西草场等村皆因唐太宗驻军而得名。后民间演化“帮军”为“邦均”。其三，邦均原名“困龙镇”，传说北山一条黄龙经常来镇上作乱害人。后来，人们用火把龙困死在镇上，故此得名。唐太宗东征兵败，逃至此，听说这个镇叫“困龙镇”，很是烦恼，便召集大臣商议更改地名，遂改为邦君(均)。三种说法，孰是孰非，由于历史久远，无法明辨。清道光十一年 (1831)，称邦均镇。

邦均镇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良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京哈、宝平公路纵横穿越，邦喜公路以此为起点，与津蓟高速公路相邻，京秦铁路、大秦铁路横贯镇北，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邦均是蓟州西部的古镇，京城去东北、清东陵的必经之路。

过去京哈路由镇子中间穿过，在东门外的关帝庙处路分两向，东南向去山海关，东北向去喜峰口。如今，关帝庙的大殿依然存在，门前一株 400 多岁的老槐树独守三岔路口。144 年前，这个小庙进入了两朝帝师、政治家、诗人翁同龢的视野。

清光绪元年 (1875)，为了给同治皇帝修建惠陵，翁同龢三去东陵，路过邦均时曾在关帝庙休息、住宿，还留下了两首小诗。这在《翁同龢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他写的小诗也收入了他的诗集《瓶庐诗稿》。

这年正月十四日 (2 月 19 日)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午正后行，策骑看山，二十里邦均店，(长街烟户甚盛)。店之东有庙，西向，榜曰‘南路赴山海关，北路通喜峰口’。入庙小憩，僧出未归，见盆梅数株，漫赋一诗，庙后有碑，大字题曰‘草地北至’(弘治十五年立)。盖古戍牧马之所也。由北路行，望盘山万松深秀，路人指山顶曰此云罩寺也。”当时，他在日记中录下《邦均小寺》《野寺盆梅盛开凄然有作，再次伯寅韵》两首小诗。其中，《野寺盆梅盛开凄然有作，再次伯寅韵》写道：“此是江南第一花，相逢冀北漫长嗟。山僧错认菩提树，人世谁知萼绿华。铁骨已经磨岁月，玉颜终恐涴尘沙。坡公廿首吾能说，岂为孤山处士家。”十天以后，翁同龢返京途中仍在邦均住店，转天游览了盘山挂月峰。

这一年旧历三月十六日 (4 月 21 日)，翁同龢由东陵返京途中，再次住在这座小庙，见到了寺僧，并写了扇面赠之。这天的日记记载：“申正抵邦均，店亦满，(镇西口二店)。折回至街内，得一店，疑有故，(室有石灰，庭有被褥)。乃寻东关外关庙居之，即正月中在此小憩者也。僧名普慧，有勇力，喜种花。阴，写扇赠僧，手瘘不可之。四更大风起。”

(作者单位：蓟州区档案馆)

市档案馆方志工作部门集体观看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推进工作调度会暨全国地方志“一体两翼”工程成果发布会实况直播

8月31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推进工作调度会暨全国地方志“一体两翼”工程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采取主会场现场会议和分会场直播会议两种形式。根据中指办要求，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市方志办主任关树锋以及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相关人员共3人出席主会场现场会议，关树锋同志作经验交流发言。按照规定，市档案馆设立分会场，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地方志馆全体同志集体观看实况直播。馆领导高度重视此次会议，馆党委书记、馆长阎峰亲临直播分会场，与大家一起观看会议实况。

这次会议主要有四项议程：第一，北京、天津、河北等11个省市作推进“两全目标”情况介绍；第二，6名“一体两翼”工程优秀成果作者发布成果；第三，中指组秘书长、中指办主任冀祥德通报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工作推进情况并作总结讲话；第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中指组常务副组长高翔讲话。

在有关省市汇报“两全目标”情况阶段，天津市作为完成“两全目标”成绩突出的代表作经验介绍，关树锋同志作了题为《攻坚克难 精准施策 咬定目标奋勇争先——天津八举措力保“两全目标”提前实现》的经验汇报。我市采取推进依法治志、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各级责任、落实制度规范、纳入绩效管理、专项督导落实等八方面有力措施，取得了提前一年全面完成“两全目标”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指办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兄弟省市的充分肯定。

会上，高翔同志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科学谋划，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国方志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担当，不负中央重托，进一步深刻认识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的重要意义；要认清当前形势，把握发展大势，进一步坚定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的信心决心；要加强科学谋划，坚持精准施策，力争“两全目标”攻坚取得更多更大战果；要立足新时代，不断开拓奋进，持续推动方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冀祥德同志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全国地方志系统要认真领会高翔同志的讲话精神，切实做好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通过观看本次会议，大家一致感到，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我们方志工作者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方志文化自信，继续发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求真务实的作风，贯彻落实好中指办各项要求，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天津方志事业发展，讲好天津故事，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天津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提升编纂质量　打造精品年鉴
2020年度天津市年鉴编纂业务工作培训班在北辰区举办

10月22日至23日，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北辰区双街镇万源龙顺庄园举办2020年天津市年鉴编纂业务工作培训班。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市方志办主任关树锋全程参加培训活动。年鉴指导部、方志指导部、规划部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市地方志馆年鉴编辑，16个区档案馆（方志办）负责人和年鉴科科长及编辑人员，有关市级年鉴编纂单位负责人（或编辑人员）共80余人参加培训。年鉴指导部主任张月光主持培训。

关树锋同志做开班动员讲话，明确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和任务要求，希望与会同志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全身心投入，认真听讲，深入研讨，悉心领悟。随后，围绕天津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展望，作了题为“修志问道，助力复兴伟业；秉笔直书，彰显使命担当”的授课讲座。

培训班特邀全国年鉴专家授课。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处长刘永强以“地方综合年鉴常见质量问题与规范要求”为题，对年鉴的编辑说明、图片运用、标题、大事记、条目编写、涉密问题、附录、编校等内容分别作了详解，以大量实例加以论证，使与会人员对年鉴编纂规范要求有了全新认识。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恒彬以“争创精品年鉴需要把握的一些问题”为题，从对年鉴的再认识、问题与出路、年鉴事业的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结合全国精品年鉴申报评审和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讲解，使与会同志对创设精品年鉴的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洪进以“增强六种意识，提高年鉴质量”为题，分别从提高政治意识、科学意识、地情意识、全面意识、标准意识、推敲意识上，对年鉴编辑提出要求，并结合例证加以分析说明，使与会同志认识到做好年鉴工作绝非易事，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加强各方面学习。

根据培训安排，22日晚和23日上午，与会人员分两个组进行研讨，围绕如何认识提升年鉴编纂质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确保“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目标任务完成、本单位在争创精品年鉴工程方面有何打算和举措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23日下午，举行培训班闭幕式，两个小组负责人汇报了分组讨论情况。规划部、方志指导部、年鉴指导部负责人分别就各自部门职责和今后工作进行了说明和部署。关树锋同志在总结讲话中对本次培训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一是政治引领、“训”字当头；二是精心组织、注重实效；三是学风严谨、聚精会神。就下一步工作，他要求全市年鉴工作者要勇于担当，争先创优；巩固成果，按时保质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在机构改革的新形势下，面对机遇和挑战要科学规划，实现创新发展。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本次培训安排紧凑、内容丰富、求真务实、富有成效。

（天津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天津市初评、复评工作圆满结束

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学会《关于印发〈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市方志办及时制定印发《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认真组织参加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活动的通知》，对天津市初评、复评工作作出部署。

截至 8 月 20 日，市方志办共收到申报年鉴 11 部，符合参评条件的 10 部，其中区级综合年鉴 7 部、专业年鉴 3 部。9 月 15 日、16 日，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天津市初评工作在市档案馆举行。市档案馆（方志办）年鉴指导部主任张月光对评审活动进行动员部署，年鉴指导部二级调研员唐旗主持评审工作，与会评委按照评审标准对参评年鉴逐一审读打分。9 月 18 日进行复评，最终确定 2 部区级综合年鉴和 1 部专业年鉴建议通报表扬等次。建议《北辰年鉴（2019）》为县区级综合年鉴一等；《滨海新区年鉴（2019）》为县区级综合年鉴二等；《天津规划和自然资源年鉴（2019）》为地方专业年鉴三等。

市档案馆党委委员、副馆长，市方志办主任关树锋参加初评和复评会议。他强调，通过评审进一步提升我市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编纂水平，在提前完成中指组“两全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力争尽快在全国精品年鉴申报中实现天津精品年鉴零突破。

此次评审是对全市年鉴编纂水平的一次检阅，不仅推荐出天津市的优秀年鉴，而且深入了解了我市年鉴编纂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急需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起直追，通过全市年鉴工作者共同努力，力争早日创出“天津品牌”。

（天津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团泊镇志》申报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通过终审

9 月 3 日，《团泊镇志》终审会在团泊镇政府召开。市档案馆（市方志办）方志指导部负责人白文平出席并宣布评审结果，区档案馆副馆长、方志办主任马永海主持评审会，主编王敬模汇报编修始末，特邀天津市文史、民俗、地方志领域专家参与评审，团泊镇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及《团泊镇志》编辑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评审专家及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相关同志肯定了《团泊镇志》的编纂质量及其存史、育人、资政价值，同时就志稿在框架布局、资料史实、突显特色、编修规范等方面提出全面、细致的修改意见。团泊镇负责同志表示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志稿再补充、再修改，镇政府将给予全方位支持，全力配合《团泊镇志》编辑部完成评审后志稿的修改完善工作。

最后，白文平同志作评审结论：《团泊镇志》总体标准上，符合《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规定；体裁结构上，纲目体运用得当，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写作方法上，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主线突出，大事必录，特色鲜明；志稿内容上，叙述流畅，内容详尽，资料翔实；志稿语言文字上，现代语体文记述准确规范，语言朴实简洁。《团泊镇志》具备存史、育人、资政功能和查考价值，同意通过终审。

（天津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